

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 以樓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

黃寬重*

本文是以兩宋之際四明地區的樓氏家族為中心，透過其家族參與地方活動與擴展人際關係為例，探討宋代四明士族的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一方面討論樓氏家族內部的興衰歷程，一方面進一步瞭解宋代四明地區士人家族人際網絡的發展，及其對地方學術文化乃至地方意識塑造的影響。

四明樓氏家族的崛起與發展，是內、外諸多因素交織而成的。以內部發展而言，樓氏經由經營產業成為小康之家，再由教育著手，通過科舉獲取功名，進入仕途，晉升為地方的名門望族。以外在關係而言，樓氏族人藉著同學、共事、交遊、婚姻等方式與四明地區著名士族，建立了廣泛而深遠的人際網絡。

四明士族的交遊與聚會，是以個人或家族關係網絡開展，進而提升四明地區整體文化及公共建設的水準。透過各個家族在教育、學習上的努力，得以維持四明在全國科舉上的優勢，並提振學風、凝聚學術氣氛，發展成為陸學的重鎮，乃至具備溝通朱、陸、呂諸學的媒介地位。詩社、真率會等耆老的社群組織以及鄉飲酒禮的實施，有助於聯絡在鄉的官僚與士大夫的情誼，不但培養士族對地方的認同感，更激發塑造鄉里文化的胸懷，形成共同推動地方公益活動的動力，因此設置鄉曲義莊、興設學校、修築橋樑及堰堤等社會公益活動陸續出現。這些活動除了增進鄉里團結外，更顯示四明士族對本土的關懷，藉由合作的方式，匯集群體的力量，創造具有文化特色的鄉里意識。這種地區性社會文化特色的建立與變化，不僅影響一地的學風，亦影響家族的發展與興替，都說明了宋代四明地區的社會發展中，家族與鄉里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全文除前言、結論外，分成五節討論。第二節探究樓氏家族在兩宋時期的興衰過程。第三節闡述樓氏的教育與學風。第四節探討樓氏如何透過婚姻，在地方上建立強固的人際網絡。第五節討論樓氏與四明士族一起推動的社會文化活動，對地方上產生的影響及其意義。第六節則是說明四明士族如何透過集體的力量，共同關心與推動社會公益活動。

關鍵詞：四明樓氏 婚姻 詩社 鄉飲酒禮 鄉曲義莊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四明屬宋代兩浙東路，北宋時期已成為經濟要區。宋政權南遷以後，四明鄰近首都臨安，成為宋朝對外的重要貿易港口，地位更為重要，經濟發展更加蓬勃，加以教育普及、文風甚盛，人才輩出，從宋元地方志所錄兩浙路進士分布的情況而言，南宋時代明州考上進士的人共計782人，占兩浙路總數3379人的23.14%。¹ 依戴仁柱 (Richard L. Davis) 教授的研究，西元一二三二年，四明占全國總人口的1.5%，但進士人口卻占492人中的48人，近10%。² 此外，學術發達，一度是陸學發展的中心，及朱、陸、呂（祖謙）三派並傳的要地，成為南宋時代推動道學、宏揚學術的重鎮，更是社會文化高度發展的地區。

促成四明地區社會文化在南宋時代呈現高度發展的原因很多，不過，自北宋崛起的幾個重要家族所開展的教育、婚姻、結社、交遊及社會公益等活動，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北宋起，四明地區崛起不少新興家族，這些家族到南宋相繼成為政治、學術上具有影響力的名族，如史家、袁家、樓家、汪家等，都是宋仁宗慶曆興學，各地普創學校之後，經由教育、科舉的途徑，取得功名，晉升為地方名族，乃至成為全國知名的望族。這些家族在發展的過程中，藉教育與婚姻關係，乃至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在四明地區建立了緊密的人際網絡，不僅有助於家族的維繫與發展，其所推動的活動，也形成四明地區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選擇一個發展歷程明確、文獻豐富的四明著名家族，藉由該家族的教育與婚姻，乃至參與的社會活動，作為觀察與瞭解四明地區士族的人際網絡及社會文化活動，當具學術意義。

四明樓氏家族從崛起、發展到衰替，前後歷時三百年，它和四明或其他宋代名族的發展一樣，是經由經營產業成為小康之家，再由教育著手，通過科舉獲取功名，進入仕途，晉升為地方的名門望族，此一過程與宋仁宗慶曆興學、普及教育有密切關係，是宋代重文政策下的受惠者，其後家族內部致力教育、傳承儒學或發展學術，並以充裕的產業奠定家族發展的基礎。對外則藉參與地方活動及締結婚姻等方式，擴展人際網絡，建立與其他士族間良好的互動，遂能在北宋末至南宋中期，與史氏、袁氏等四明望族齊名，擁有相等社會地位。

¹ 黃寬重，《宋史叢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10月初版），頁85-90。

² Richard L.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8-29, 261.

樓氏家族的族人，藉由不同的方式參與四明地區的活動，不僅塑造了個人與家族發展的有利條件，也有利於發展四明地區的社會文化。這一個發展過程，正是觀察與討論宋代四明地區，士人家族的人際網絡及社會文化活動的重要方向。從這個角度去觀察，不僅對四明士族的興衰歷程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可以對宋代四明地區的政治、社會發展，與學術文化的塑造過程有更清楚的認識。因此本文擬以樓氏家族為中心，經由家族參與地方活動與擴展人際關係為例，探討宋代四明士族的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一方面填補筆者以往只從樓氏家族內部討論其興衰歷程之不足，³ 一方面也可以進一步瞭解宋代四明地區士人家族人際網絡發展，對地方的學術文化乃至地方意識塑造的影響。

關於四明樓氏發展的討論，除筆者的論述外，尚有不少可觀的成績，如美國學者 Linda Walton 以“Kinship, Marriage and Status in Song China: A Study of the Lou Lineage of NINGBO”為題，分別就樓氏家族的興起、發展、義莊、婚姻及人際網絡等，探討家族如何藉科舉、家族與婚姻等方式的結合，以獲得、維繫乃至鞏固其在地方上的名望。⁴ 余國隆在《樓鑰年譜及其行誼》論文中，也略述樓氏家族發展歷程。⁵ 包偉民則有《宋代明州樓氏家族研究》一文，分三個階段說明樓氏家族發展興衰的現象，並分析其原因。⁶ 此外，梁庚堯在《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一文中，⁷ 以整個四明地區幾個重要家族，經由彼此的合作，共同推動的地方公益活動為主；其中頗有涉及樓氏家族的婚姻與人際網絡，對了解樓氏家族的發展與四明地區的社會現象有重要意義。本文在寫作時，參考前述作者的觀點，以四明樓氏家族為中心，討論的範圍擴及教育、婚姻、交遊、學術、社群、公共建設等社會公益活動，其中學術、社群及公益活動涉及範圍較廣，則不以樓氏家族為限。利用的史料包含樓鑰的《攻媿集》、宋元時代四明地方志、南宋四明地區重要士人的文集及相關典

³ 黃寬重，〈宋代四明樓氏家族的興衰歷程〉，《史學：傳承與變遷》（臺北：臺大歷史系主編，1998年6月），頁237-261。

⁴ Walton, Linda, “Kinship, Marriage, and Status in Song China: A Study of the Lou Lineage of NINGBO, 1050-1250,”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8.1(1984): 35-77.

⁵ 余國隆，〈樓鑰年譜及其行誼〉（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6月）。

⁶ 包偉民，〈宋代明州樓氏家族研究〉，《大陸雜誌》94.5(1997.5)：31-39。

⁷ 梁庚堯，〈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213-237。

黃寬重

籍，並輔以近人研究成果。由於資料整理費時，撰文倉促，其中必多疏誤、遺漏之處，敬請同道先進不吝指教，以便修訂時改正。

二、樓氏家族的興衰概況

（一）崛起

樓氏的先世為浙東婺州東陽縣人，後來遷婺州，再由婺州遷到明州奉化縣。由於早期資料隱晦，遷徙的時間與世系都不清楚，據包偉民的推斷，樓氏由婺州遷奉化的時間大約在唐末五代。⁸ 遷徙的動機大約與家族分產，或是逃避黃巢亂軍攻婺州（西元880年）有關。

經過幾代的艱辛與努力，到樓皓時，樓氏已是四明地區富甲一方的大姓。⁹ 樓皓為人慷慨豪邁，篤信佛教，曾在奉化縣營建告成、明化等寺塔院觀，並且到杭州購買十部新印《華嚴經》及雕印《法華經》木板，印行百部，分送境內佛寺。約在真宗咸平（998-1003）以前，因財富捐官被授以「奉化縣錄事」的職位，這是四明樓氏首次由地方豪富之家，轉任具職銜的名位，成為四明地區的士紳。樓皓生四子，次子樓杲是位篤厚種德之人。

樓郁是四明樓氏家族崛起的關鍵人物。郁字子文，是杲的兒子，皇祐五年（1053）中進士，這是樓氏家族由地方士紳正式成為官僚的第一人。他曾任舒州廬江主簿，以祿不及親，辭官返鄉，在家鄉的州縣學教書三十多年，是四明地區「慶曆五先生」之一，¹⁰ 對開啟四明學風居功厥偉。他教育鄉里、培養人才之外，對子弟的教育也很重視，確立了樓氏家族讀書應舉、儒學傳家的家風。樓郁的致力教育的做法，很快的奠下發展的基礎，同時也迅速擴展了在四明地區的人際網絡，是樓氏家族崛起的重要關鍵。

⁸ 包偉民，前引文，頁223。

⁹ 樓鑰，《攻媿集》（四部叢刊本）卷八五〈高祖先生事略〉，頁780。

¹⁰ 四明慶曆五先生指楊適、杜醇、王致、王說與樓郁，見倪士毅，《浙江古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初版），頁154。

(二) 轉折

樓郁有五個兒子，俱傳其業，其中長子樓常和次子樓光先後中進士，幼子樓肖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

樓常為治平三年（1066）乙科進士，曾知興化軍，元符三年（1100）七月至崇寧元年（1102）十二月，以朝奉大夫知台州。¹¹ 樓光才氣俊偉，中熙寧九年（1076）進士，歷任無為軍判官、知畿縣。樓肖字夢弼，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樓氏兄弟三人都是在家道興盛之初，由其父辛勤培養、致力教育，及彼此勤勉向學而中舉入仕的，這在文風初開的四明而言，無疑地也是地方上一項難得的盛事。經父子二代的努力經營，樓氏家族已然成為四明的仕宦階層。

到了樓郁的孫子輩，更是樓氏家族躍升明州名族的關鍵時期，不過，此時家族內部各房支在仕途上的發展，也呈現了極大的差異。

樓光的子嗣不詳，大約有二個以上的兒子。樓肖有五子二女，次子名，字元應，舉進士不第，遂不復為場屋文，晚年信奉佛教，遍歷名山古剎。

樓常一房，是樓氏家族晉升四明名族的最大關鍵。他有二子，長子弁中元符三年（1100）進士，曾任宗子博士。¹² 次子昇，字試可，元豐八年（1085）登進士第，歷內外諸官職，曾宰登封、知泗州、秀州等。政和七年（1117），宋廷命樓昇知隨州，他入辭時，向徽宗提出二個建議，其一是在明州設置高麗司，創造百艘舟船，以供應來往使臣之所需。其二則是將當地歲久湮塞的廣德湖，闢墾為田，以其田租供應高麗司之費用。¹³ 徽宗接納他的意見，乃改命他知明州。樓昇上任後，積極任事，組織民役疏鑿溝塘，改進水利，積極墾湖為田，以充供億之用，共治湖田七百二十頃，歲得穀三萬六千石。¹⁴ 這項措施的收入，對加強宋麗關係有積極的貢獻，宋廷乃以「應奉有勞」、「職事修舉」為名予以獎勵，進官至徽猷閣待制。宣和二年（1120），方臘起事，兵鋒直趨四明，昇調集豪勇，乘城

¹¹ 黃②，〈嘉定赤城志〉（宋元方志叢刊本）卷九〈本朝郡守〉。參見包偉民，前引文。

¹² 〈攻媿集〉卷五二〈求定齋詩餘序〉，頁490。

¹³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三五四〈樓昇傳〉，頁11163。又見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宋元方志叢刊本）卷九〈神廟〉，頁7上。

¹⁴ 〈宋史〉卷三五四，頁11163。唯據〈至正四明續志〉卷九〈祠祀〉「豐惠廟」條引至元三年（1266）況逵所撰記則稱「歲得穀三十餘萬斛」（頁7上），從〈宋史〉本傳所記。

捍禦，逼退群盜，一郡獲安。¹⁵ 因守城有功，進封徽猷閣直學士；¹⁶ 此外，他大力將淤湖變成田，增建水利設施，當地父老為感念他的恩德，特立生祠。

樓異在明州的施政中，最引起爭議的是將廣德湖墾為農田，此一措施，雖然一時造福地方，並增加國庫收入，但隨後卻由於水利問題，引起極大的爭論。

不過，從樓異典鄉邦以後，在明州城南大肆營建「畫錦坊」，及畫錦橋、錦照橋、錦照堂，繼 堂等相當大規模的建築，供諸子眾居，¹⁷ 甚至要仿倣范氏義莊的規模設置樓氏義莊。¹⁸ 可見樓異知明州五年，不但使他個人在家鄉擁有很大的影響力，提高樓氏家族在四明地區的名望，更為家族累積了可觀的財富。這是樓氏家族在四明地區發展上名利雙收的重要階段。

樓異有五個兒子，琛、 、 琚、 璩、 瑒，都是以蔭入仕。他們青壯年的時候，正值南北宋政權交替之際。變幻莫測的世局，使得樓氏兄弟，在仕途的發展上呈現很大的區別；樓琛與樓瑒事蹟不詳，三子樓琚曾官右朝散郎。¹⁹ 四子樓璩，曾任監進奏院、知處州、²⁰ 通判明州等官，終朝議大夫。

樓異的諸子中以樓 的政績最卓著。 字壽玉，一字國器，²¹ 紹興三年(1133)任臨安府於潛令時，²² 留意農事，作《耕織圖》一書，把農桑要務，完全呈現出來，是研究中國農業史、科技史的重要著作。²³ 歷任湖北轉運使、湖南轉運使兼知潭州、知揚州²⁴ 權兼淮南轉運司事等，²⁵ 所至有聲。 致仕後，仿范氏義莊的規範，在鄞縣購置良田五百畝，建立義莊來幫助族人。這一義莊，使樓氏宗黨受惠者近六十年，對凝聚族人的向心力有很大的貢獻。²⁶

¹⁵ 《攻媿集》卷八五〈高祖先生事略〉，頁781。

¹⁶ 《宋史》卷三五四，頁11164。

¹⁷ 羅濬，《寶慶四明志》（宋元方志叢刊本）卷八〈畫錦樓氏義田莊記〉，及《寶慶四明志》卷四〈橋梁〉、卷一〇〈敘人下〉。

¹⁸ 《攻媿集》卷六〇〈范氏復義宅記〉，頁547-548。

¹⁹ 《攻媿集》卷一〇五〈從妹樓夫人墓誌銘〉，頁1034。

²⁰ 《攻媿集》卷七二〈書石門披雲集後〉，頁662。

²¹ 《攻媿集》卷七六〈跋揚州伯父耕織圖〉，頁708。

²² 《攻媿集》卷七六，頁708；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四庫全書本）卷六六，紹興三年六月戊子條，頁3下。

²³ 《攻媿集》卷七六，頁708。

²⁴ 《攻媿集》卷八一〈次韻伯父與心聞偈〉說「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維揚」，頁749；又見卷七四〈又錢希白三經堂歌〉，頁677。

²⁵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頁7上。

²⁶ 《至正四明續志》卷八〈畫錦樓氏義田莊〉引況逵記文，頁18；又見《攻媿集》卷七六，前引文。

從樓常到樓 的三代，是樓氏在四明發展的重要時期。樓常、樓光及其子異，上接樓郁，在科場上均有所成，奠下了樓氏在四明的聲望，尤其樓異守明州五年，使樓家成為四明地區的望族。到了樓 兄弟，都是由蔭補入官，在世局驟變、情勢紛擾的時代裡，兄弟彼此在仕途的發展，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性。建炎三年（1129）金兵入侵明州，對四明造成巨大的災難，樓家五代辛苦經營的家業付之一炬，以致樓璩必須帶妻小投靠外家汪氏，他的兒子也自小長於外家，這是樓家發展歷程中一項轉折。由於外在環境的巨變及家族成員的不同遭遇，形成族人各自獨立發展以及兄弟貧富有別的現象。樓 以積極的態度，創置義莊來凝聚族人的向心力。可見樓氏家族的發展，因時局的變動形成不同的趨向，但在努力與凝聚之下，孕育了更為繁盛的一代。

（三）盛極而衰

第七至九代是四明樓氏家族發展上變化極大的時代，主要是以樓異的房支為主，其中第七代是最繁盛的時期。

樓異有三個事蹟可考的兒子——樓 、樓琚與樓璩。

樓 至少有四個兒子。次子名鏗，字仲宏，性資孝，謹事親。樓琚有五男六女。長子樓鈺，事蹟不詳，其餘諸子中，生平事蹟較顯著的有樓鉉、樓鉅與樓鉉。

樓鏗與樓鉉是南宋初年最早中進士的樓氏族人，也是興復樓氏家族地位的重要人物。鏗字景山，²⁷ 自幼有聲場屋，以詞章聞於時。紹興三十年（1160）中進士，歷任宗正寺主簿、玉牒所檢討官、樞密院編修官等。淳熙中，任知江陰軍時，曾修貢院以加惠學者，治績以最聞。後自九江移武昌知鄂州，因病求致仕。

樓璩有九子二女，其中事蹟可考者為樓錫、樓錫及樓鑰。樓鑰更是四明樓氏家族中仕歷最高的人。

樓鑰是璩的三子，字大防，紹興七年（1137）生。鑰幼居外家，聰敏過人，師事王默、李鴻漸、鄭鏗等人。隆興元年（1163）中進士。曾隨仲舅汪大猷使金，著有《北行日錄》，從陳傅良游，聞八陣圖說於薛季宣。²⁸ 曾任詳定一司敕

²⁷ 王德毅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第五冊作「樓鉉自號求定齋」，証之《攻媿集》卷五二，頁490及卷七三，頁672-674所述求定齋當為樓鏗。包偉民殆從索引，亦誤。

²⁸ 《樓鑰年譜及其行誼》，頁49-52。

黃寬重

令所刪定官、通判台州、宗正寺主簿、太常博士、知溫州等職。光宗朝，歷任太常少卿、太府少卿、起居郎、權中書舍人等官。上劄子諫光宗過重華宮以盡孝道，調和兩宮，著有勞績。寧宗即位之初，鑰掌內外制，得代言體。遷給事中，仍兼實錄院同修撰、直學士院、權吏部尚書兼侍讀。他在政治上附同趙汝愚，論救彭龜年、呂祖儉，抨擊韓侂胄。慶元黨禁興，鑰即丐歸，致仕居家十三年。及韓侂胄被誅，宋廷以翰林學士召鑰，歷任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等官。嘉定六年（1213）卒，享年七十七歲。鑰通貫經史，文辭精博，著有《范文正年譜》及《攻媿集》一百二十卷。妻王氏，有子四人、女二人。²⁹

樓鑰任官至侍從、居兩府，前後數十年，在他的蔭庇下，三個弟弟與仲兄樓錫的兒子樓澡，都由奏補為官，³⁰ 其成績較諸樓異「諸孫以門蔭入仕者又數十人」³¹ 尤有過之，是四明樓氏家族最盛的時期。

四明樓氏到第八代，其盛況雖難與前代相匹配，但家族整體的表現仍相當傑出。包偉民教授從現存宋元四明地方志中，錄出樓氏第八代中進士的名單包括：樓汶（慶元二年1196 鄒應龍榜）、樓淮（嘉定四年1121 趙建大榜）、樓洙（寶慶二年1226 王會龍榜）等共十一人。不過，這些人看不出與上述曾任官宦或有仕宦事蹟者如鏗、鉉、鑰、錫、鏞、鏞的世系關係，且無重要的仕宦事蹟可查，他們與明州樓家各房支的關係，尚須釐清。

有事蹟可考的樓氏第八代，則包括樓鑰與樓鏗的兒子。樓鑰四個兒子的生平分別是：長子樓淳，字質夫，官至屯田郎中。次子樓濛早逝。三子樓瀟曾通判臨安府。幼子樓治曾權兵部侍郎。³² 樓鑰諸子都是以蔭入仕，雖未能繼鑰之後在朝廷擔任要職，但承襲家風，以德行自勵，在仕途上猶有相當的表現。樓鏗有四子，均由其妻蔣氏扶養成人。長子樓淵，曾知婺州浦江縣，賜緋魚袋。³³ 次子樓源早亡。三子樓洪曾刊印樓 的《耕織圖詩》行於世。幼子樓深，嘉泰二年（1202）為國學生，仕履不詳，但收藏書畫甚多，大約樓 藏之文物均歸深所藏。³⁴

²⁹ 袁燮，《絜齋集》（四庫全書本）卷一一〈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頁1上-34下；袁桷，《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叢刊本）卷五，頁7上-8下；《樓鑰年譜及其行誼》，頁35-121。

³⁰ 《絜齋集》卷一一，頁31下。

³¹ 《攻媿集》卷八五〈高祖先生事略〉，頁781。

³² 《絜齋集》卷一一，頁27下，及《延祐四明志》卷五，頁8下。吳廷燮，《南宋制撫年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年4月初版），卷上，頁431。

³³ 《攻媿集》卷一〇五，頁1033。

³⁴ 《攻媿集》卷七二，頁658-659；卷七四，頁678-681。

總之，樓氏的第八代在科場和仕途上，尚有足堪告慰的成績，使上代在四明奠下的望族聲譽，得以維繫及穩定發展。但從現存的資料看來，這一代在科場得意者，仕履並不突出，反而是由蔭入仕者，表現比較好。

四明樓氏到了第九代，在科場上的表現仍然相當突出。據包偉民教授從相關的四明方志所錄資料，中舉者包括樓采等十一人。³⁵ 人數與上一代相當，可惜由於資料不足，他們的世系與仕履都無法確知。其他因蔭入仕者的資料也不全。此時樓家的整體情況很難進一步掌握。他們所處的理、度兩朝，正是趙宋王朝面對內外衝擊最大、政局日益衰敗的時期。在這種情形下，樓氏家族的成員，不論以科舉或以蔭補入仕，可能由於考試成績並不突出，或者承襲儒學傳統，謹守家規、重視鄉里，並不熱衷於參與爭權奪利的中央朝政，或在抗禦外侮中領袖群倫。因之，此時樓氏家族殆已由政治之途，退回鄉里，維持社會名望而已。這些名門之後，相當重視文行操守，喜歡收藏文物典籍，對經濟條件的追求也可能不太看重，像樓冶身亡時，家無餘金，就是一例。³⁶ 這些都是樓氏家族由興轉衰的一個訊息。

宋元之際，是四明樓氏衰替的關鍵時期。樓氏從開慶元年（1259）起，未見科舉及第的記載。尤其宋元政權交替之際，蒙古軍隊進犯四明，對當地造成巨大的破壞。家業頗大的四明樓氏，受創的程度，較之建炎三年（1129）金兵短期入侵所帶來的災禍，尤有過之。其後元至元二十四年（丁亥，1287）及大德十年（丙午，1306），樓氏家族的義莊又相繼遭族人盜賣瓜分，乃至為富民所侵，導致畫錦義莊幾乎荒廢。³⁷ 這些不利於樓氏家族發展的種種因素，接踵而至，遂使已由政壇退回鄉里的樓氏家族，在入元之後「族婁旦弱」一蹶不振了。

三、教育與學風

第三代的樓郁是樓氏家族中，最早與其他四明士族投入地方教育，推動教育普及的人。明州當五代干戈相尋之時，賴吳越錢氏之保完，經濟、文化得以繼續發展。及歸宋，太宗於淳化二年（991）頒賜國子監本九經，以示崇儒教化之意。

³⁵ 包偉民，前引文，頁226。

³⁶ 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四明叢書本）卷七九，頁47。

³⁷ 《至正四明續志》卷八〈畫錦樓氏義田莊〉，頁20上-21下。

時值承平、經濟發展、人口穩定成長，但學者尚少。經歷任知州的鼓舞，學風日盛，³⁸ 元代學者程端學即指出：「宋當明道、景祐間，天下文物大備，郡國學校獨未建，惟上橋陳家，闢屋儲書卷、擇明師，教其鄉人。」開啟私家在地方從事教學的風氣。³⁹ 及范仲淹推動慶曆興學，明州地區相繼設立學校。此時，宋廷明定不置教授員額的地方，由鄉里推擇教授。⁴⁰ 樓郁以古學基礎深厚，為鄉人所推崇，首被郡選，受邀掌縣學多年，後來轉任明州郡學，舉家遷至明州城內，又掌郡學十餘年。中進士後，僅短暫任舒州廬江主簿，即辭官返鄉，仍以主持州縣學，教育鄉里子弟為職志。王安石任鄞縣宰時與他定交，稱讚郁「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內。」⁴¹

樓郁篤好學術，學問博洽，又強調「學以窮理為先」，在四明地區教學凡三十餘年，造就了不少傑出的人才，當地出身的名臣如豐稷、舒亶、袁穀、汪鏞、俞允、羅適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對開啟四明學風，貢獻甚大，四明人尊稱他為樓先生而不名。與在四明致力教育的楊適、杜醇、王致、王說並稱為慶曆四明五先生。

樓郁是四明五先生中影響最大的一位。四明地區經五先生的努力經營，風氣為之丕變，「為士者日眾，善人以不教子為愧，後生以無聞為恥，故負笈而從師友、執經而游學校者踵相接焉，州舉進士，較藝決科者又相繼而輩出。」⁴² 王應麟也指出：「宋慶曆建學之初，楊、杜、二王、樓公，以道德文行師表後進，或授業鄉校，或講道閭塾，衣冠文獻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⁴³ 說明五先生透過州縣學及私塾發揮教育的效果。全祖望對五先生開啟四明學風，尤為推崇，他說：「夷考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求聞達，年望彌高，陶成倍廣，數十年以後，五鄉遂稱鄒魯。」⁴⁴ 說明四明在五先生的啟迪下，不僅文風興盛，也經由教育及士人的交流逐漸激盪成為一個文風鼎盛的地區，這其中樓郁無疑是最突出

³⁸ 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宋元方志叢刊本）卷九〈修九經堂記〉，頁12上-13下。

³⁹ 程端學，《積齋集》（四明叢書本）卷五，頁15上、下。

⁴⁰ 《寶慶四明志》卷八，頁9。

⁴¹ 王安石，《王安石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10月影印）卷三四〈與樓郁教授書〉，頁61。

⁴² 《乾道四明圖經》卷九，頁12下-13上。

⁴³ 王應麟，《深寧文鈔·摭餘編》（四明叢書本）卷一〈九先生祠堂記〉，頁11下。

⁴⁴ 全祖望，《鮚埼亭集》（臺北：華世出版社影印，1977年3月初版），外編，卷一六〈慶曆五先生書院記〉，頁865-866。

的，他是五先生中唯一的進士，任教的地區又是文風繁盛，經濟富庶的明州城及奉化，他的學生舒亶、袁覿、羅適、豐稷等人為鄉里首選，後來相繼中舉入仕，在朝政與學術上均有表現，成為四明等地著名家族。

樓郁在教育子弟的同時，也推動鄉里教育，使樓氏的興起與四明新興的科舉社會相結合，有利於鄉里人際網絡的建立。樓皓致富之後，成為四明鄉紳階層，經過樓郁的努力，更將樓氏轉型為學術文化性的地方名族。樓郁既重視家族子弟的教育，又在鄉里作育英才，顯示樓氏家族在崛起之後，透過教育，締造儒學傳家的家風，並且藉著教職教育鄉人，提昇四明的文化。而他的後人與其門人「皆執友」，⁴⁵ 這種參與地方教育的方式，不僅提高樓氏家族在四明的社會地位，也使樓家可以與四明地區的著名家族，建立了廣泛而長遠的人際網絡。

經過樓郁等人的努力，四明學風昌盛，中舉者日多，各地競相成立學校，除州學外，設於唐代，在慶曆年間已存在的鄞縣縣學，至崇寧、大觀年間移至縣城西南，確立其規模；⁴⁶ 奉化縣學先於景祐中初建於石夫人廟，治平三年（1066）遷於縣東，宣和初重建，運作順利；⁴⁷ 慈溪縣學於雍熙元年（984）由縣令李昭文建立，慶曆八年（1048）林肇移至縣治東南；⁴⁸ 定海縣則於崇寧中增修先聖殿為學宮；⁴⁹ 四明的文風學術日益昌明，這些學校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都為四明地區的文化奠下重要基礎。

樓郁遷居鄞縣城南，對家族的教育、學術的發展尤為關鍵。城南地區是鄞縣教育重地，如姚氏是四明富室，姚阜為人輕財好施，曾創必慶堂於城南，「延碩師，聚族人、子弟就學」，遂致子孫相踵擢第，成為四明著姓。其孫姚孝全克遵家教，培養益深，繼續以私塾教育子弟。⁵⁰ 同鄉的楊氏家族，在南宋高、孝之際由楊萃在城南設家塾，延聘福州名師鄭鏐為塾師，除了教育楊家子弟外，鄰近的青年鄉人，如樓鑰兄弟、袁燮、袁方、邊汝實、姚穎，也獲邀參加，一齊接受鄭鏐的教誨。⁵¹ 遷居到四明不久的徐立之也曾聘鄭鏐教其子子寅學詩。⁵² 鄭鏐字剛

⁴⁵ 《攻媿集》卷七四〈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頁681。

⁴⁶ 《寶慶四明志》卷一二，頁7下。又見《延祐四明志》卷一三〈鄞縣儒學〉條，頁31下-32上。

⁴⁷ 《寶慶四明志》卷一四，頁5下。

⁴⁸ 《寶慶四明志》卷一六，頁9上。

⁴⁹ 《寶慶四明志》卷一八，頁9上。

⁵⁰ 《絜齋集》卷一五〈通判平江麻校書姚君行狀〉，頁1上。

⁵¹ 《絜齋集》卷一一，頁2上；卷一六，頁1下、10下；卷一八，頁9上。

⁵² 《攻媿集》卷九一，頁854。

中，號三山，是福州人。他「該貫群經，多有講解，旁通子史百家，文備眾體，尤工於賦，立詞用韻，精切平妥。」⁵³ 他嚴於教學，寓居四明後，受聘於楊氏家塾，開館授徒，教育出許多著名的政治官員與學者，為四明的重要教育家。鄭鏐於紹興三十年（1160）中進士，曾任屯田員外郎及寧宗為皇子時之小學教授。此外，樓鑰兄弟也與其他四明士子共同師事鄉先生李若訥。李若訥是四明地方有名的鄉先生，樓鑰幼時和二位兄長樓錫、樓錫從他學習；奉化人鮑璿也將二個兒子德光與俊德送到州城內，師事李若訥。⁵⁴ 另一位奉化人戴光世的妻子劉氏也送獨子日宣到城內，求學於號稱耆儒宿望的李若訥。⁵⁵

這種幼年學習的歷程，除了透過科舉影響個人仕途及家族前途外，從地方的角度，同學情誼則更奠定、鞏固家族間的關係。樓氏家族的成員與同鄉少年共同的學習經驗，成了樓氏與四明其他家族維持情誼的重要基礎；如樓氏因同學的因緣，與另一個四明著名家族袁氏延續了幾代深厚的情誼，就是一個好的例子。樓郁為袁穀的老師，樓鑰兄弟又與袁方、袁燮一同師事鄭鏐，袁燮未中進士前，也曾在城南樓氏精舍授徒。袁燮在為樓鑰寫的行狀中說：「我高祖父光祿公實師事正議先生，源流相續，以至於今。公又不以眾人遇我，嘉泰、開禧間從公于寂寞之濱，數以安于命義，保全名節之語勉我，斯意厚矣。」⁵⁶ 樓鑰則代其舅父汪大猷為文祭袁章。⁵⁷ 可見樓鑰與袁氏第四、五代的袁方、袁燮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樓鑰在跋袁光祿穀與東坡同官事跡一文中，也說：「兩家子弟衰門既幸未墜，而公之後，儒風日興，有孫字質甫，好古篤學，教子有聞於時，其興殆未艾也」，⁵⁸ 最能說明兩家的關係。他又為文輓袁章、⁵⁹ 袁文⁶⁰ 及有詩送袁燮任江陰尉。⁶¹ 兩家經由教育、學習所建立的關係，稱得上源遠流長。

從樓氏藉著袁氏第五、六代在四明地區的學術網絡，開擴了與當時四明重要學術家族的人際關係，更可看出此種人際網絡層層開展的方式，其意義並不限於

⁵³ 《攻媿集》卷五三〈鄭屯田賦集序〉，頁499-500。

⁵⁴ 《攻媿集》卷一〇一，頁985。

⁵⁵ 《絜齋集》卷一九，頁4上。

⁵⁶ 《絜齋集》卷一一，頁33下-34上。

⁵⁷ 《攻媿集》卷八四，頁775。

⁵⁸ 《攻媿集》卷七七，頁713-714。

⁵⁹ 《攻媿集》卷一三，頁151。

⁶⁰ 《攻媿集》卷一三，頁149。

⁶¹ 《攻媿集》卷一，頁10-11。

直接關連者。四明是南宋中期重要的學術中心之一，王應麟說：「淳熙之舒、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根本，闡釋經訓，躬行實踐，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⁶² 這四位先生袁燮與舒璘、沈煥、楊簡正是陸學的傳承與發揚者，誠如全祖望所指「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為首」。⁶³ 先是，史浩既歸鄉里，築真隱園以遂首丘之情，並致力鄉里教育，乃延致沈煥居於竹溪，楊簡講學於碧沚，袁燮也常自江陰回鄉，與舒璘、呂祖儉等人共同研討學術，致力教學，發皇陸學。⁶⁴ 袁燮是陸門弟子中官職最高，學生又多，成為發揚陸學的重要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有位狀元兒子袁甫來繼承衣鉢，進而發揚光大。甫幼服父訓，燮死，乞銘於楊簡，簡館之於家塾，反覆扣辨，了然於所傳之學，成為慈湖的大弟子。父子二人不論教授鄉里，或是任職地方學校與中央太學，乃至開設書院，對理學的推展貢獻很大，在四明地區有著豐富的人際網絡。樓鑰經由袁氏父子，遂得與四明最活躍的陸學人士建立密切的關係。《攻媿集》中即有樓鑰舉薦楊簡⁶⁵ 及與楊簡論詩解的長信、⁶⁶ 祭舒璘、舒璘兄弟的文等，⁶⁷ 舒璘也有書信致樓鑰。⁶⁸

除了陸學之外，四明也是朱學、呂學的重地之一，全祖望即說：「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又說：「吾鄉前輩於三家之學並有傳者」。⁶⁹ 樓鑰與朱子、呂祖謙及其傳人，也有密切來往。⁷⁰ 樓氏在理學三派中雖親近陸學，仍與其他二派維持關係，成為推動四明學術與聯結不同學派的

⁶² 《深寧文鈔·摭餘編》卷一〈九先生祠堂記〉，頁11下。

⁶³ 黃宗羲，《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影印新校本，1987年9月初版），卷七七，頁74。

⁶⁴ 甬上先生是指象山門人中楊簡、袁燮、沈煥、舒璘四人，見《鮚埼亭集》，外編，卷一四〈四先生祠堂碑陰文〉，頁841。時舒璘出遊，代以呂祖儉。又見外編，卷一六八〈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頁870。

⁶⁵ 《攻媿集》卷三一，頁284；又見《絜齋集》卷一一，頁31下。

⁶⁶ 《攻媿集》卷六七，頁607-614。

⁶⁷ 《攻媿集》卷八三，頁771。

⁶⁸ 舒璘，《舒文靖公類》（四明叢書本）卷一，頁17上-19下。

⁶⁹ 《宋元學案》卷七四〈慈湖學案〉、卷七五〈絜齋學案〉，頁2459-2540。

⁷⁰ 樓鑰有〈答朱晦菴書〉（《攻媿集》卷六六，頁602）、〈跋朱晦菴書中庸〉（卷七六，頁705）、〈論朱熹補外〉（卷二六，頁255）、〈繳朱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卷三〇，頁277）。另有〈祭呂太史〉（卷八三，頁766）、〈東萊呂太史祠堂記〉（卷五五，頁515）。

黃寬重

重要人物。這顯現樓氏家族在推動四明教育普及、提振學風及塑造學術環境上，均有其貢獻。

從教育對樓氏家族的發展看來，教育除了關係個人仕進，維繫家族地位於不墜之外，更可透過學習的過程，開展個人與家族的關係，形成地區士人間的人際網絡；而學術網絡的建立與開拓，不僅有利於塑造地方的文化特質，對家族而言，更是在仕宦之外，擴展社會勢力的有效方法。

四、婚姻與人際網絡

除了藉由受教育的過程與四明其他士族建立人際網絡外，樓氏家族的成員也因同學、共事等機緣，與當地官僚、士人等相互聯絡、交往，建立密切情誼。不過，這些卻不如經由婚姻所建立的關係，來得更緊密。同時，透過婚姻關係所張開的網絡，使樓家與四明地區的士人家族，建立了既緊密又複雜的人際關係，結成一個盤根錯節的關係網。

樓氏家族在崛起、發展的歷程中，因不同的機緣建立婚姻關係的對象，包括四明地區的汪氏、馮氏、王氏、蔣氏、姜氏等，以及四明以外的陳氏、張氏、周氏、孫氏等，相當廣泛。對樓氏家族在四明地區人際網絡的擴展而言，與當地家族的婚姻關係，顯然較為重要，因此本節特以樓氏與四明士族間的婚姻關係為例，說明由此所建立的人際網絡，及其所衍生的學術傳承。

四明王氏與樓氏有著淵遠流長的關係。王氏原為桐廬人，王仁鎬於吳越時任官明州，舉家遷於鄞縣之桃源。⁷¹ 仁鎬的曾孫王說，字應求，是另一位四明教育家王致的從子，⁷² 受業於楊適，教育鄉里三十餘年，⁷³ 與樓郁同為慶曆明州五先生之一。因此樓、王二家關係甚深，淵源甚早，樓鑰即說：「王氏、樓氏自二先生以道義定交」。⁷⁴ 王說的孫子王勳為政和八年（1118）進士，高宗命為鄞縣宰，以廉稱。⁷⁵ 勳有三子，長子正己，以蔭任官，鄉人史浩薦知泰州海陵縣，魏

⁷¹ 《攻媿集》卷九九，頁963。

⁷² 《宋元學案》卷六，頁8上。

⁷³ 《寶慶四明志》卷八，頁11下。

⁷⁴ 《攻媿集》卷一〇〇，頁967。

⁷⁵ 《寶慶四明志》卷八，頁12上。

杞薦知江陰軍，⁷⁶ 紹熙末年，以有清德雅望，見重於趙汝愚，⁷⁷ 後任太府卿、秘閣修撰、浙西提刑。他娶樓昇的季女為妻，是樓鑰的姑丈，這是二家締姻之始。王正己的女兒嫁給樓鑰同輩的樓錄（官將仕郎）為妻，一個孫女則嫁樓滌（樓鑰的大哥樓錫的兒子）。⁷⁸

正己次弟正功字承甫，以蔭入仕，曾知蘄州、廣西提刑，死於嘉泰三年（1203），享年七十一歲，幼弟正民曾知安慶府。⁷⁹ 王氏三兄弟都是以蔭任官，勇於任事，所至有功，而為官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不受」，所至未嘗飾治器用，不市一物，為鄉評所歸。⁸⁰ 三兄弟宦蹟甚著，樓鑰說「余與侯（王正功）有道義之好，又為世姻，侯之兄弟皆承清白之傳」，⁸¹ 樓鑰為正己與正功寫墓誌銘，袁燮為王正功寫行狀。⁸²

王氏家族自王瓘起即喜藏書，以文稱，家族均富著作。王說有《五經發源》五十卷。⁸³ 他的弟弟王該善詩，有遺稿十卷。說的三子珩有《考經傳異同論》三卷、《臆說》五卷、《時政更張議》四卷、《字學摭要》二卷、《雜言》三卷，和杜詩一百七十一篇。⁸⁴ 王正己三兄弟則好讀書，「一意于學，忍貧深居，窮經閱史，手自編輯」，⁸⁵ 聚書六萬餘卷「多自讎校，為之且甚詳」，藏書樓曰「酌古堂」。正己有詩文、奏議，名為《酌古堂集》。⁸⁶ 正功「性嗜學，多錄未見之書，唐諸帝實錄略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萬餘卷」，善詩，有《荊澧集》行於世。⁸⁷

總之，王氏雖然不像樓氏家族出現不少高官，但在四明卻代表以學術傳承的地方名族，兩家的淵源甚早，關係頗深，當與彼此相近的學術文化水準有關，這樣的關係，到南宋初更因締結婚姻，而更加強固。

⁷⁶ 《攻媿集》卷九九，頁964。

⁷⁷ 《攻媿集》卷七五，頁697。

⁷⁸ 《攻媿集》卷九九，頁965。

⁷⁹ 《攻媿集》卷一〇〇，頁967-968。

⁸⁰ 《攻媿集》卷一〇〇，頁969-970。

⁸¹ 《攻媿集》卷五四，頁507。

⁸² 《攻媿集》卷九九，頁963-966；卷一〇〇，頁967-970。

⁸³ 《寶慶四明志》卷八，頁11。

⁸⁴ 《寶慶四明志》卷八，頁12上。

⁸⁵ 《攻媿集》卷五二，頁485。

⁸⁶ 《攻媿集》卷五二，頁485。

⁸⁷ 《攻媿集》卷一〇〇，頁969-970。

與樓氏關係密切的另一個四明家族是汪氏。汪氏為鄞縣人。汪元吉曾任縣從事，以掌法為范仲淹所知。王安石宰鄞縣，以廉平吏薦於孫沔，⁸⁸ 這是汪氏崛起之時。汪元吉與樓郁相交，郁為他寫墓誌。⁸⁹ 元吉生四子，一子洙，號儒先，曾任明州助教，以春秋學聞名於鄉，是汪氏列名四明士族之始。⁹⁰ 洙有二子，長子思溫有聲場屋，政和二年（1112）由太學上舍中乙科，改秩，知餘姚縣，高宗時任提舉江西茶鹽，歷兩浙轉運副使、太府少卿，後以不附秦檜罷，紹興二十七年（1157）卒，享年八十歲；⁹¹ 二子思齊為高宗潛藩舊臣，建炎初擢吏部郎，因病死。⁹² 無子，思溫以第三子大有過繼為思齊之子。

思溫有七女，女婿包括陳膏、徐子寅、向子遇、洪筏及樓璩，璩即鑰之父，這是汪、樓二家締婚之始。思溫長子是大雅，曾任紹興府諸暨縣丞。⁹³ 次子大猷，字仲嘉，紹興十五年（1145）中進士，歷官吏部郎，為莊文太子侍講、權刑部侍郎，曾奉使賀金國正旦、知泉州、知隆興府等，以討茶商賴文政之亂敗事，被罷，後進敷文閣學士，慶元六年（1200）死，年八十一。⁹⁴ 大猷娶樓异之女、璩之妹，大猷一女嫁璩子樓鏞（鑰之弟）。⁹⁵ 思溫的三子大定，字秀應，以蔭入仕，曾隨大猷使金。寧宗初，知江州事，謹朱墨、節浮費。慶元四年（1198）卒，年六十二。⁹⁶

汪氏二代仕宦，與當朝名臣多所來往，又有墳庵、田產，是四明富厚之家、名門望族。⁹⁷ 汪思溫勇於為義，視人急難如己，而且樂善好施，對自外流寓而來的貧乏寄客多施援手，因此四方遊士歸心。⁹⁸ 史浩與孫覿曾分別為汪思溫寫行狀及墓誌銘。汪大猷除樂於助人外，更喜歡延譽後進，「識葉公翥於掌故之中，交

⁸⁸ 《延祐四明志》卷四，頁34下。

⁸⁹ 《攻媿集》卷六〇，頁548。

⁹⁰ 孫覿，《鴻慶居士集》（四庫全書本）卷三七，頁16下。

⁹¹ 《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16上-25上；《寶慶四明志》卷八，頁32上、下；《延祐四明志》卷四，頁34下-35上。

⁹² 《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2上。

⁹³ 《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3上。

⁹⁴ 《寶慶四明志》卷八，頁33上、下；周必大，《文忠集》（四庫全書本）卷六七，頁1上-10上。

⁹⁵ 《文忠集》卷六七，頁8上。

⁹⁶ 《攻媿集》卷一〇三，頁1013。

⁹⁷ 《攻媿集》卷六〇，頁549。

⁹⁸ 《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34上。

遊如錢尚書象祖、劉侍郎孝臚，史待制彌大、都司潘疇，屯田鄭鏐、簽州沈銖，推揚汲引，惟恐不及」，⁹⁹ 因此其甥樓鑰為他寫行實、名臣周必大寫神道碑。樓、汪二姓的婚姻，對樓氏而言，不僅藉此與當地名門望族結成綿密的關係，為樓氏擴展了在四明地區的人際網絡。更重要的是，樓異所創造的樓氏美好家園，在建炎三年（1129）遭受金兵侵擾，家園全燬時，璩的薪俸不加，家庭生計日窘，他的妻、子不得已搬到汪家，受其照顧，¹⁰⁰ 樓鑰兄弟的童年都是在外家渡過的，他們的教育也由汪家負責，對樓鑰兄弟養育與提攜之功甚大。

因著汪家的婚姻關係，也使樓氏與其他旅居四明的名族緊密結合，陳居仁就是一例。居仁字安行，是陳膏的兒子。膏由興化宦游至四明，娶思溫之女為繼室。居仁幼遭母喪，由汪家扶養長大。居仁歷任要職，受知於魏杞、史浩、汪應辰等人，¹⁰¹ 「歷任四朝，出藩入從，飾己甚嚴，了無玷缺，天下之言長者莫先焉」，惜官物如己物，治公事如私事，喜讀書，尤熟於班左，有奏議制稿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最後以華文閣直學士終，享年六十一。他與樓鑰為表兄弟，二人自幼俱生長外家，與汪大猷同任學士，鄉人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稱。¹⁰²

旅居四明與樓氏家族有婚姻關係的著名家族尚有姜氏、徐氏。樓氏與這兩家的關係也是汪氏所造成的。姜氏原為開封大姓，富盛甲京師，婚姻多后妃侯王之家，家世顯赫。姜氏重儒學，藏書豐富，延請太學名士教育子弟，汪思溫、思齊在開封任鄆王、肅王、景王府贊讀時，¹⁰³ 「皆嘗授館，通家如至親」。靖康之難，姜氏因汪思溫之助寓居四明，遂為四明人。在思溫兄弟的協助下，姜氏得以重振儒業家聲，二家並締姻緣，汪大雅娶姜浩之妹為妻，¹⁰⁴ 姜浩之弟濤與魏杞及大雅、大猷均在家塾受教，思溫也將孫女嫁給姜浩次子姜棫為妻。¹⁰⁵ 姜浩六個女兒，一位嫁給史彌謹，一位嫁樓氏族人樓漆。¹⁰⁶ 姜浩娶懷仁皇后的姪女，深受魏杞、梁克家、周葵、吳芾等人的器重，他的幾位兒子中「出仕猶賴前數公提挈之

⁹⁹ 《文忠集》卷六七，頁10上。

¹⁰⁰ 《攻媿集》卷八五，頁782, 785。

¹⁰¹ 《攻媿集》卷八九，頁832。

¹⁰² 《攻媿集》卷八九，頁834。

¹⁰³ 《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16下。

¹⁰⁴ 《攻媿集》卷一〇八，頁1060。

¹⁰⁵ 《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3下。

¹⁰⁶ 《攻媿集》卷一〇八，頁1058。

黃寬重

力」，¹⁰⁷ 其公子姜柄娶魏昶之女。¹⁰⁸ 樓鑰幼年生長外家，不僅有緣從姜浩游，也與浩的幾位兒子共學，使二家的關係更為親密。姜浩的行狀是汪大猷寫的，樓鑰則寫墓誌銘，姜柄的生平事蹟是袁樞寫的，也由樓鑰寫墓誌銘。

徐氏原為登州黃縣人，徐立之在紹聖初中進士，靖康之難南渡後徙居四明。初到四明時，家貧甚，立之篤意教子，鍾愛子寅，紹興十年（1140），子寅以蔭補官，十八年（1148）銓選授官，任建州司法參軍，歷任大理評事、知無為軍、高郵軍、工部郎中、知揚州及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等官，慶元元年（1195）死，享年六十六歲。徐子寅娶思溫之女，是樓鑰的姨丈，有女五人，史浩的孫子史宣之及汪大猷兒子汪立中，都是他的女婿。樓鑰早年與子寅同舍讀書，子寅後來變成他的姨丈，二人的關係更親密。¹⁰⁹

馮氏也是樓氏的重要締姻對象。馮氏為慈溪富室，雖在仕宦上無顯赫的成績，但在當地卻有相當的影響力。馮制家有穀數千斛，康定年間大飢，制以穀貸鄉人，賴以全者百餘家。¹¹⁰ 他也曾調和王致、樓郁、袁穀等對水權的爭論。大概是他的孫女嫁給樓昇為妻，這是二姓建立婚姻之始，其後代又嫁給樓璩的次子樓錫為妻。¹¹¹ 此外，樓璩的女兒樓靚之（字）嫁給新昌人石文，而石文的母親馮氏與樓昇之妻同宗，¹¹² 因此樓氏與石、馮二氏是親上加親。馮氏的後人馮端方、馮仁叟、馮興宗（振甫）、似宗（國壽）等與樓鑰為表兄弟。¹¹³ 馮興宗與似宗均師事楊簡。興宗於書無所不讀，袁甫於紹定五年（1232），在貴溪創立象山書院，曾請他擔任山長。¹¹⁴ 馮興宗的舅舅也是岳父李必達，原為餘姚人，家富饒，喜救濟，遷至四明，遣其長子師尹，師事沈炳（陸學傳人沈煥之弟），並將長女嫁沈炳之子沈唯曾，而其次子李師說，則娶袁燮弟袁樞之女，袁樞亦聘其女為庶子之妻。¹¹⁵

¹⁰⁷ 《攻媿集》卷一〇八，頁1059。

¹⁰⁸ 《攻媿集》卷一〇六，頁1047。

¹⁰⁹ 《攻媿集》卷九一，頁858。

¹¹⁰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頁64。

¹¹¹ 《攻媿集》卷八五，頁785。

¹¹² 《攻媿集》卷一〇五，頁1034。

¹¹³ 《攻媿集》卷六八，頁623、卷八三，頁772；（清）馮可鏞輯，《慈湖先生年譜》（四明叢書本）卷一，頁42上。

¹¹⁴ 袁甫，《蒙齋集》（四庫全書本）卷一八，頁8上；卷一三，頁10下-14上，17上、下。

¹¹⁵ 《絜齋集》卷二〇，頁4下-6下；《蒙齋集》卷一八，頁9上。

從樓氏與馮氏的婚姻網絡，可以看到樓氏如何間接與當時四明學術主流——陸學形成千絲萬縷的關係。以下暫將討論重心，轉移至四明陸學的婚姻網絡，藉以與前述樓氏人際網絡的分析相呼應，並可瞭解樓氏在其中的角色。

陸九淵兄弟在四明地區的主要傳人有四：楊簡、袁燮、沈煥、舒璘，這四人都都是同學，有著共同信服的師長與信仰的學說。但除了理念外，這些人子弟生徒間錯雜的婚姻關係，更加強了這個群體的凝聚力量，從而顯示學術團體與家族這種社會關係的結合。袁文的女婿之一吳适是沈銖的學生，吳适的父親鑑之則為沈銖的女婿。¹¹⁶ 袁文另一位女婿戴樟是其夫人戴氏的侄兒，¹¹⁷ 高閔的學生，¹¹⁸ 戴樟的女婿胡華是袁燮、楊簡的學生。¹¹⁹ 袁燮的女婿舒鑣是舒璘的兒子，¹²⁰ 另一位女婿樓槃為樓氏族人。¹²¹ 楊簡的女婿舒銖，也是舒璘的三子，¹²² 沈煥的女婿則有呂祖儉的兒子呂喬年及舒璘的長子舒鉞，¹²³ 呂、舒二人都是沈煥的及門弟子。舒璘的原配童氏是其師童大定的女兒，繼娶同鄉富人汪汝賢之女，汝賢二子汪伋、汪份都是師事沈煥、楊簡等。¹²⁴ 樓鏜的孫子樓稅娶同鄉人舒衍（沂）的女兒，衍也是沈煥、楊簡的及門弟子。¹²⁵ 舒宣的裔孫舒烈受業於沈銖，¹²⁶ 而舒烈為四明富室邊友誠的女婿。¹²⁷ 袁燮則是友誠之兄友益的女婿。¹²⁸

陸氏門人相聚學習的經驗一如真德秀在《袁燮行狀》中所說：「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為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大」，¹²⁹ 由於陸學的入門路徑與此時理學主流朱熹有所不同，因此門人砥礪之志

¹¹⁶ 《絜齋集》卷二〇，頁14下-15下。

¹¹⁷ 《絜齋集》卷二一，頁12上。

¹¹⁸ 《攻媿集》一〇六，頁1038。

¹¹⁹ 《絜齋集》卷一九，頁18下。

¹²⁰ 楊簡，《慈湖先生遺書補編》（四明叢書本），頁5下-6上。

¹²¹ 《絜齋集》卷一七，頁7上。

¹²² 楊簡，《慈湖先生遺書》（四庫全書本）卷一八，頁24上。

¹²³ 《絜齋集》卷一四，頁15下。

¹²⁴ 《絜齋集》卷一九，頁5下-8下。

¹²⁵ 《絜齋集》卷二〇，頁16上-17上。

¹²⁶ 沈煥，《定川遺書附錄》（四明叢書本）卷四，頁3上、下。

¹²⁷ 《絜齋集》卷二〇，頁20上-22上。

¹²⁸ 《絜齋集》卷二一，頁16下。

¹²⁹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四七，頁723。

黃寬重

愈堅，沈煥即說「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為長技，甚可懼也」，¹³⁰ 藉著砥礪學習加深了同門的感情。而婚姻關係的建立，更將血緣繫緊同學的情誼，形成門派師承的巨大凝聚力。此外，經由學派中人與當地著名士族建立的婚姻網絡，可能也使當地人容易認同或接納此一學說，陸學於是逐漸地成為本地的學術主流，四明遂成為南宋陸學的重鎮。樓鑰雖非陸學中人，但以其仕歷、學識、聲望及與陸學門人既有交遊又有婚姻的關係，當也扮演著陸學在四明傳播、擴散的媒介角色。

五、社群與文化活動

樓氏家族與四明士族一齊推動的活動，除了教育、學術之外，尚有具社會文化意義的事務。從這些活動，可以反映南宋時代四明士族在其交往過程中，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團體意識，進而有共同經營、創造具備典範性社會的企圖。這其中，聚集致仕或卸任鄉居的士大夫及官員組成的詩社或「真率之會」，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唐代已出現詩社之名，白居易所創的洛陽九老會，就是一個有組織、有固定成員和活動地點、定期聚會的團體。¹³¹ 宋代的文人結社的情形更為活躍，其中以屬於怡老性質的詩社，多冠以耆英會、九老會、真率會一類的名稱，參加者多為退休官員，年齡在七、八十歲以上，主盟者多曾在朝任高官，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些文人在「序齒不序官」的規則下，屏除矯飾、繁文縟節，追求率性樸素的「真率」氣氛，¹³² 以組織的形式集結成員定期聚會，逐漸產生集體意識。這類的結社，在宋代可考的即有六、七十家。如元豐年間，在北方最著名的，有司馬光、富弼、文彥博等退居西京的元老重臣所組成的洛陽耆英會；在南方的蘇州（吳郡），則有以鄉居官員徐師閔、元絳、程師孟等人發起的九老會。¹³³

四明地區的士人家族，世代業儒，彼此的關係又延續了好幾代，在同一地區長期的聯繫，形成家族間綿密的人際網絡。他們經由交遊聚會，經常舉辦共同關

¹³⁰ 沈煥，《定川遺書》（四明叢書本）卷二，頁1上。

¹³¹ 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頁153。

¹³² 歐陽光，前引書，頁29-42。

¹³³ 鄧小南，〈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國學研究》卷三，頁463-466。

心的活動，達成分享生活經驗、聯絡情誼的目的。南宋時期，四明地區以詩社、交遊為宗旨的集會，就有五老會、八老會及尊老會、真率會等。

五老會是在高宗紹興年間組成的，成員都是歸老於鄉，年齡在七十歲以上的太學舊人，參加的人包括宗正少卿王玠、朝議大夫蔣璿、郎中顧文、知衡州薛朋龜及樓鑰的外祖父太府少卿汪思溫。¹³⁴ 除汪思溫外，蔣璿為蔣浚明之子，登紹聖四年（1097）進士，官至中奉大夫，嘗知江陰縣，其弟琬有女嫁樓鑰之子樓鏜；¹³⁵ 顧文為崇寧五年（1106）進士，官至郎中；¹³⁶ 王玠是四明慶曆四先生之一王說的第三子，大觀三年（1109）進士，任至宗正少卿，¹³⁷ 是王正己、王正功兄弟的祖父，正己是樓異的女婿。薛朋龜字彥益，政和八年（1118）進士，歷官權工部及吏部郎官，知興國軍、衡州，¹³⁸ 他是高閌的岳父。這四位耆老在致仕後與汪思溫結社林下，被稱為四明五老。袁燮就指出：「紹興間，吾鄉年高德劭者有五人焉，其學問操履，俱一邦之望，時時合并，有似乎唐之九老、本朝之耆英，故謂之五老。繪而圖之，傳之至今。」¹³⁹ 他們都是進士出身，又曾任官，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力，致仕之後，在彼此的園林中，賞花賦詩，以詩唱和，成為他們晚年排遣時間的重要方式。這當是南宋初期四明地區首次出現的老人結社。

繼五老會而起的是八老會。五老會組成後，在四明同有聲譽的高閌和吳秉信，因年齡尚輕，無法加入。後來，王玠和薛朋龜相繼辭世，適參知政事王次翁致仕，回鄉寓居，仰慕五老會的義風，倡議改組為八老會。於是蔣璿、顧文、汪思溫、高閌、吳秉信、王次翁、徐彥老和陳先就成為這個社群的成員。高閌字抑崇，紹興元年（1131）賜進士出身，授秘書正字，歷任禮部郎國子司業，曾更定三舍法，後以得罪秦檜致仕。¹⁴⁰ 吳秉信，字信叟，曾為國學官，因奉使察張浚卜宅僭越事，違秦檜意，被黜返鄉。後為吏部侍郎，曾與凌景夏論內侍，出知常州。¹⁴¹ 秉信之兄秉彝有後裔吳适為袁燮之妹婿，從沈銖學。王次翁字慶曾，崇寧進士，通詩、書、易、春秋，號兩河先生，紹興初曾任湖南參謀官，未老致仕，

¹³⁴ 《攻媿集》卷七五〈跋蔣元宗所藏錢松窗詩帖〉，頁695。

¹³⁵ 《攻媿集》卷一〇五，頁1032。

¹³⁶ 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光緒19年刊本）卷三三，頁3下。

¹³⁷ 《寶慶四明志》卷八，頁12；《宋元學案》卷六，頁8上。

¹³⁸ 《延祐四明志》卷四，頁44下。

¹³⁹ 《絜齋集》卷一八，頁8上。

¹⁴⁰ 《延祐四明志》卷四，頁43上、下。

¹⁴¹ 《絜齋集》卷二〇，頁4下；《延祐四明志》卷四，頁41下-42上。

居於四明。及秦檜任相，拜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等，贊檜和議。迎章太后時得罪，致仕，歸居四明。¹⁴² 他的兒子伯庠，登紹興二年（1132）進士，曾任通判平江軍府、鎮江軍府、知興國軍、侍御史、知夔州、溫州等，伯庠與汪氏相契，其女嫁汪大有。¹⁴³ 徐彥老為朝議大夫，只有陳先是布衣。由於八老會的成員功名和仕履的差異性較大，像王次翁才遷四明不久，陳先是平民，不像五老會的成員都是進士，性質上「已不及前日之純全矣」。¹⁴⁴ 不過，這也顯示，這種北宋以來以「衣冠盛事」為特色的傳統，在明州由於參與成員的資歷不等，逐漸轉而加強「鄉誼」的成分，而成為更具鄉里交遊性質的聚會。

繼八老會而成立的是尊老會，大約是孝宗隆興年間史浩罷相家居時所創的。尊老會的成員和活動的情形，文獻不足，無法得其詳，但主盟的史浩所存文集《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八有「四明尊老會致語」（乾道八年，1172），卷三九有五老會致語、六老會致語，卷四七「滿庭芳」詞中有題為「四明尊老會勸鄉大夫酒」、「勸鄉老眾賓酒」、「代鄉大夫報勸」、「代鄉老眾賓報勸」及「代鄉老眾賓勸鄉大夫」以及同卷「最高樓」詞中小序所稱「鄉老十人皆年八十，淳熙丁酉（1177）三月十九日，作慶勸酒」。¹⁴⁵ 可知尊老會和上述五老會或八老會的性質是一致的，只是參加的成員有所變動而已。

由四明耆老組成的五老會或八老會乃至尊老會，樓氏族人都沒有參加。不過前後都參與並且是主盟之一的汪思溫是樓鑰的外祖父，鑰的兄弟幼年住在汪家，耳濡目染，不僅熟悉情形，也與這些耆老或其後人建立了情誼，等到他們有足夠的資歷和條件時，很自然的成為其中的一個成員。

樓鑰所參與的是由他的舅舅汪大猷領導的真率之集。真率之集的成員，可能與尊老會有所重疊，或是名雖異而實為一會，參加的人包括史浩、汪大猷、魏杞、趙粹中、樓鑰、周模和袁章。樓鑰曾指趙粹中「遽退，閒居鄞十年，夷然不以得喪芥蒂，與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尚書汪公為真率之集。」¹⁴⁶ 趙粹中，字叔達，為密州人，其父趙濬因官東南，葬於明州，子孫遂為鄞人。粹中於紹興二十

¹⁴² 《延祐四明志》卷四，頁4上、下。

¹⁴³ 《攻媿集》卷九〇，頁835-839。

¹⁴⁴ 《攻媿集》卷七五，頁695。

¹⁴⁵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四庫全書本）卷三八，頁2上-3下；卷三九，頁1上-2下；卷四七，頁3上-6上、15下。參見歐陽光，前引書，頁236。

¹⁴⁶ 《攻媿集》卷九八〈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頁955。

四年（1154）中進士，曾任太常寺主簿，為岳飛雪冤，歷任起居郎、吏部侍郎、知池州、湖州等。淳熙六年（1179）罷官後參加真率會。¹⁴⁷樓鑰在祭粹中的文中說：「四明尚齒，猶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寓公。公居其間，俯首鞠躬，人化其德，事之滋恭。某等辱居里閭，許入社中，登臨歌，樽酒從容。」¹⁴⁸另一位真率會的成員周模字伯範，是明州的望族，他的曾祖父周師厚是皇祐五年（1053）進士，為范仲淹的女婿。他的父親周淵為右儒林郎，死時周模才十七歲。家道中落，促使周模放棄學業，致力營生，重整建炎時被兵燬的房舍。致富之後，周氏戮力於文化及慈善工作，因此雖是布衣之身，仍被汪大猷邀約加入真率之集。樓鑰罷官返鄉時也加入此一聚會，樓、周二人年齡相近，棋藝相當，關係相當密切。¹⁴⁹袁章也是真率之集的成員；章字叔平，是袁穀的後人、袁文的弟弟、袁燮的叔父，入太學屢試不中，以教書為業，乾道五年（1169）章五十歲才中進士。先後任諸暨縣主簿、泰州、和州州學教授、通判常德府。¹⁵⁰樓鑰在代其舅汪大猷所寫的祭文中，指袁章是位耆儒，「少鳴膠序，文高行孤，中年漫仕，日著令譽，晚益倦游，有宅一區，安貧樂道，隨時卷舒。惟余齊年，往來舒、徐，凡我同社，視公步趨，有几有杖，有琴有壺，載平時問字之酒，奠今日一束之芻。」¹⁵¹

真率會的主盟人汪大猷，字仲嘉，號適齋，是汪思溫的次子，紹興十五年（1145）進士，高、孝二朝分別在中央與地方任官，淳熙二年（1175）茶商賴文政之叛時被罷。大猷未六十即退閒，¹⁵²回到鄉里，參與舊有的詩社等組織，以及推動鄉里建設，樓鑰說「凡里中義事，率自公倡之。賓客造門，必與鈞禮，不問遠近，必親謝其門」，¹⁵³大猷是繼史浩之後，成為真率會的主盟者，「真率之約，觴詠琴奕，未嘗以爵齒自居。」¹⁵⁴慶元元年（1195）樓鑰因趙汝愚之誣及論救呂祖儉之貶，得罪當道，乞補外，並以「母老易危，暑行致疾，群醫俱試，百口相

¹⁴⁷ 同上註。

¹⁴⁸ 《攻媿集》卷八三，頁763。

¹⁴⁹ 《攻媿集》卷一〇九〈周伯範墓誌銘〉，頁1068-1069。

¹⁵⁰ 《絜齋集》卷一六，頁12下-18上。

¹⁵¹ 《攻媿集》卷八四，頁775。

¹⁵² 《文忠集》卷六七，頁1上-10下；《攻媿集》卷八八，頁810-822。

¹⁵³ 《攻媿集》卷八八，頁820。

¹⁵⁴ 《攻媿集》卷八八，頁820-821。

驚」為詞乞祠，¹⁵⁵ 得奉祠返鄉，時年五十九。鑰返鄉後追隨大猷，參與真率會，作詩唱和，舅甥二人渡過極具意義的六年。樓鑰在大猷的「行狀」中說「公既謝事，而鑰得奉祠，六年之間，有行必從，有唱必和，徒步行來，殆無虛時，劇談傾倒，其樂無涯。」¹⁵⁶ 樓鑰的文集中就有多首記述汪大猷參與真率會的詩，如「適齋約同社往來無事形」次韻說：「舅氏年益高，何止七十稀。神明曾未衰，髮黃齒如兒，義概同古人，閭里咸歸依。度量海深闊，仁愛佛慈悲，居然三達尊，後生顧影隨，為作真率集，率以月為期。凡我同盟人，共當惜此時。間或造竹所，寧容掩柴扉，耆英古有約，不勸亦不辭，此意豈不美，謹當守良規。」¹⁵⁷ 又有「真率會次適齋韻」、¹⁵⁸ 士穎弟作「真率會次適齋韻」¹⁵⁹ 及「次適齋韻十首」中的「會」也作「歸來鄉曲大家間，同社仍欣取友端，無事銜杯何不可，有時會面亦良難，少曾環坐坐常滿，賴有主盟盟未寒，琴奕相尋詩間作，笑談終日有餘歡。」¹⁶⁰

由樓鑰的詩句，可以看出經由真率會的活動，大猷舅甥與相同背景、共同關懷的鄉里耆老，藉著詩詞唱和琴奕交流，一齊渡過豐富文化生活的晚年。在交流中，鞏固、增進了彼此的情誼，進而引發共同興趣，凝聚集體的觀念。這種群體觀念，從詩詞唱和中固然可以體會出來，但從進而討論共同關心的鄉里議題，以及以行動推動崇尚禮教的鄉里活動，則更為具體，也更能顯現具有特色的四明文化。

四明耆老，在推動不序年齒、以詩詞抒懷、聯誼的真率會、詩社之類的集會的同時，也推行一項以尊老、序齒及象徵團結、建立集體意識的「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是周代鄉學中舉行酒會的禮節，秦漢以來，曾長期為士大夫所沿用。根據楊寬對《儀禮·迎酒禮》的研究，這個禮節包括：（一）謀賓、戒賓、速賓、迎賓之禮，（二）獻賓之禮，（三）作樂，（四）旅酬，（五）無算爵、無算樂及（六）送賓及其他。古人在習射前，社祭、臘祭後，乃至在鄉校中都舉行鄉飲酒禮。這個典禮的重點在尚齒，具有辨明尊卑、長幼，以及加強內部團結

¹⁵⁵ 《攻媿集》卷一六〈謝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頁176。

¹⁵⁶ 《攻媿集》卷八八，頁821。

¹⁵⁷ 《攻媿集》卷六，頁78。

¹⁵⁸ 《攻媿集》卷一二，頁135。

¹⁵⁹ 《攻媿集》卷一二，頁136。

¹⁶⁰ 《攻媿集》卷一二，頁141。

的作用。¹⁶¹ 隋唐以來，鄉飲酒禮的儀式反而以行於科舉及學校為多，具有教化的作用。¹⁶² 裴耀卿於開元十八年（730）奏請配奏樂歌，¹⁶³ 其後格而不行。

宋真宗時，孫何獻五議，其中即有請行鄉飲酒禮。¹⁶⁴ 北宋時雖也曾在明州州學行此禮，唯不得其詳，¹⁶⁵ 建炎三年（1129）明州州學被金兵所燬，禮廢不講。一直到紹興七年（1137），仇愈守明州，重建州學，再行此禮。仇愈可能受到四明名士高閔所撰《鄉飲酒儀》的內容的啟發，又舉行鄉飲酒禮。¹⁶⁶ 其後仇愈正式任知明州，更買田一百零六畝作為行鄉飲酒禮的經費，¹⁶⁷ 鄉人王伯庠曾作記說：「明之學者，自是歲時得舉行盛禮，明長幼、厚人倫、敦龐和輯之化，由此興起，則受公之賜，豈有窮也」，¹⁶⁸ 這個禮制是南宋建立後，首次施行。鄉人林保參照明州施行的辦法，制定了《鄉飲酒儀》，紹興十一年（1141）加以修定損益，定名為《鄉飲酒矩範儀制》，禮部奏請遍下郡國施行。明州乃將已行的儀制與林保的規式參酌改定，於紹興十三年（1143）四月，正式鑲版頒行，並且有九項約束。¹⁶⁹ 林保曾權吏部侍郎，他的兒子林勉娶袁埴的女兒（即袁燮的姑姑），¹⁷⁰ 孫女之一嫁樓鑰長子樓淳為妻。¹⁷¹

宋廷頒佈的《儀制》，標示尊卑之別，確定鄉里耆老在儀式中的角色，以及適應各地不同狀況的權宜措施。其後宋廷規定各地在舉辦科考之年，同時舉行鄉

¹⁶¹ 楊寬，〈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古史新探》（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280-309。

¹⁶²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卷一五〈選舉〉三，頁353；卷五三，頁1483。

¹⁶³ 《通典》卷七三，頁2007-2008；《宋史》卷一四二〈樂〉，頁3340-3341。

¹⁶⁴ 《宋史》卷三〇六〈孫何傳〉，頁10097-10098。

¹⁶⁵ 《乾道四明圖經》卷九〈州學序拜田記〉，頁9上。

¹⁶⁶ 黎德靖編，《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卷八七〈鄉飲酒〉，頁2265-2266。

¹⁶⁷ 《宋史》卷三九九〈仇愈傳〉，頁12127；《乾道四明圖經》卷一，頁10下；卷九，頁9上。

¹⁶⁸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39下；又《至正四明續志》卷一一〈仇待制鄉飲酒置田記〉，頁14上、下。

¹⁶⁹ 徐松，《宋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7），禮46之1-4〈鄉飲酒禮〉；參見《文忠集》卷六八〈林保神道碑〉，頁11上-15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八，頁19上。

¹⁷⁰ 《絜齋集》卷二一，頁7下-10上。

¹⁷¹ 《文忠集》卷六八，頁14下。

飲酒禮，也就是三年一次，但也允許每年都舉行。¹⁷² 不過，由於鄉飲酒禮的禮制相當繁雜，許多地方都難以為繼，只有明州仍然舉行。只是，仇愆所撥的田被移作養士之用，經費無著，酒禮中止。

乾道五年（1169）明州再恢復「鄉飲酒禮」。當時知明州張津撥鄞縣、昌國縣二地沒官田二百六十畝及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給州學，作為行酒禮的經費，並責由州學教授率當地父老主持。¹⁷³ 汪大猷等耆老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大猷勸當地巨室助修州學後，「冬至歲旦，序拜有規，主盟斯事，少長以禮，推年長者為學賓，遇釋菜則為祭酒，自編于布韋之間，以為一鄉矜式。」¹⁷⁴ 此後，鄉飲酒禮成為明州地區持續舉行的文化特色之一，在耆老的領導下，當地士人不僅熱烈參與典禮，甚至出錢出力，如寶慶三年（1227）郡守胡 議行禮時，郡士出錢百緡資助，鄉人厲氏也助五十緡，而整個典禮是由鄉人戶部尚書何炳董理，「日會耆俊，參訂同異，潤色綿蕞，六邑風動」。何炳為城南富室楊璘的妻兄。¹⁷⁵ 淳祐六年（1246），明州州學再行飲酒禮，參加者三千人，由樓鑰的外甥、林勉的孫婿、陳居仁的兒子陳卓為首賓席儀。¹⁷⁶

在南宋朝廷的推動下，曾有若干地方舉行鄉飲酒禮，如秀州澉浦、嚴州、¹⁷⁷ 古田縣、¹⁷⁸ 金壇縣、¹⁷⁹ 眉州，¹⁸⁰ 明州卻是最早恢復也是舉行最久的地方。明州士人高閔、林保對儀制、儀式的研究與推動，不僅使它成為全國性的規範，更使鄉飲酒禮之行，凝聚明州士人的向心力，創造出較具特色的文化風氣。元代四明士人程端禮在《慶元鄉飲小錄序》中就說：「鄉飲酒禮 漢晉唐咸知舉行於郡縣，蓋以道德齊禮，莫重於斯。廢墜之久。在宋淳化間，四明獨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紹興以後，賢守相濟，繼訂禮益精，且立恒產，以供經費，風俗之美，文獻之盛，遂甲他郡。」¹⁸¹ 這項典禮能夠順利推動，持之長久，歷任郡守的

¹⁷² 《宋會要》禮46之4。

¹⁷³ 《乾道四明圖經》卷九，頁9上、下。

¹⁷⁴ 《攻媿集》卷八八，頁820。

¹⁷⁵ 《蒙齋集》卷一八，頁9下-10上。

¹⁷⁶ 《寶慶四明志》卷二，頁17上、下。

¹⁷⁷ 參見伊原弘，〈宋代の浙西における都市士大夫〉，《集刊東洋學》45(1981)：50-68。

¹⁷⁸ 《宋史》卷四二四〈洪天錫傳〉，頁12655。

¹⁷⁹ 《宋史》卷四二四〈孫子秀傳〉，頁12663。

¹⁸⁰ 《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傳〉，頁12966。

¹⁸¹ 程端禮，《畏齋集》（四明叢書本）卷三，頁4下-5上。

知文守節，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要持續舉行，形成一種文化傳統，則像王伯庠、汪大猷、何炳、陳卓等四明著名望族，率領鄉人積極參與活動，貢獻才力，無疑是更重要的推動力。藉著此一活動的實施，增強了士族及耆老在地方學校、科舉等文化方面的角色，以及明州士人的凝聚力，對建立明州學術文化傳統，貢獻厥偉。

六、社會公益活動

四明士人由交遊、共學、結社，乃至建立婚姻關係，均使彼此的關係更為堅強。在增進關係的同時，彼此互相激盪影響，凝聚濃厚的鄉里意識，激發塑造鄉里文化的胸懷，進而形成共同推動地方公益活動的動力，創造出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

四明士族透過集體的力量共同關心與推動的公益活動，包括義莊、學校及橋樑等公共建設。這些集體活動是從個別家族發展而起的。義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自范仲淹創置家族內部經濟互助的義莊以來，成為家族穩定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因此南宋以來逐漸風行。四明是宋代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當地崛起的士族，了解科舉對家族興衰的重要性，為了增強家族的經濟力量，以創造有利的競爭條件，以及避免家族崛起後各房支的不平等發展，造成家道沒落，對這種經濟互動的因素更為重視。以樓氏家族而言，樓異守明州五年期間，不僅為個人在家鄉累積了足夠的影響力，更為家族累積了可觀的財富，以及提昇了家族的社會地位。這時候，他本來有意仿照范氏義莊的規模，設置樓氏義莊，以保障、促進家族的整體發展。¹⁸² 不過，可能因北宋晚年東南的變亂及政局的動盪，未能如願。¹⁸³ 到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侵擾明州，樓家辛苦累積的產業，遭到巨大的損失，對樓氏家族的發展構成嚴重的考驗。因此樓 在致仕後，斥俸祿之餘，仿范氏義莊的規範，在鄞縣購買良田五百畝，建立義莊，來幫助貧苦無業的族人，¹⁸⁴ 這是樓氏發展的重要基礎。除樓氏外，樓鑰的表兄陳居仁，為了照顧在福州莆田的族人，也命他的兒子買田二頃，設置義莊，仿照范氏的辦法，來支援貧困的族

¹⁸² 《攻媿集》卷六〇〈范氏復義宅記〉，頁547-548。

¹⁸³ 宣和二年（1120）方臘起事曾攻四明，不久政局不穩，宣和六年（1124）異死。

¹⁸⁴ 《至正四明續志》卷八，頁18；《攻媿集》卷七六，頁708。

人。¹⁸⁵ 這種「家族」義莊的設立，顯示他們超越「家」而重視「族」的意識，就現實層面而言，從第二節所述樓氏家族的興衰即可見到，在綿延十代的過程中，進士往往出自不同的房支，顯然可以看出以族為單位，遠較個別家庭更能綿延久遠、長保興盛。因此，義莊不僅照顧貧苦族人、有利於維持各房支的發展，同時也是擴大家族整體發展的基礎。

四明的士族，除了照顧族人之外，也習於救濟他人，如樓昇「以列卿領畫繡，義襟素高，卹孤濟急，不遺餘力，鄉人猶能道之」。¹⁸⁶ 樓鑰的母親汪氏「喜周人之急」，¹⁸⁷ 他的哥哥樓錫「人有所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傾身以應之」，¹⁸⁸ 他的舅舅汪大猷「產業素薄，僅足自給，納祿之後，用亦寢窘，隨力周施，嫁人之孤女，葬貧者之喪，不知其幾」。¹⁸⁹ 此外，像建炎三年（1129），金兵侵擾明州之後，造成大飢荒，米斗千錢，慈溪富室章詔就「傾其積以食餓者，病給之藥，愈然後去。遠不能歸者，託諸其親，不幸死者，葬之」，他的兒子章景及孫子章煥也都「力于為善」，認為「救人之饑，自吾家故事，何敢忘之」，因此里中艱食者，多賴章家以濟，躬行善道不為空言。¹⁹⁰ 這類的例子很多，難怪沈煥要說「吾鄉義風素著，相調相恤，不待其富者能之」。¹⁹¹

除了家族及個人從事慈善救濟工作外，由於四明士族之間密切的交往、同學、共事乃至婚姻關係，使彼此之間，建立了綿密的人際網絡，因此只要有人從中推動，極易由家族與個人間的參與，進而形成集體力量，一齊投入地方公共事務的活動，汪思溫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媒介人物。汪家是四明的富室之一，思溫為人「慷慨特達，勇於為義，視人急難如己」，當時有不少流寓到四明的人，困乏而死，無法埋葬，思溫「為首倡，士大夫應之翕然，故四方遊士皆以公為歸」，¹⁹² 思溫儼然成為四明行善團的領袖。繼汪思溫而主盟者就是王伯庠，鑰在王伯庠的《行狀》中說：伯庠「財好義，不計家之有無，義所當為，無所吝

¹⁸⁵ 《攻媿集》卷八九，頁833。

¹⁸⁶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43上。

¹⁸⁷ 《攻媿集》卷八五，頁783。

¹⁸⁸ 《攻媿集》卷八五，頁790。

¹⁸⁹ 《攻媿集》卷八八，頁820。

¹⁹⁰ 《絜齋集》卷二〇〈章府君墓誌銘〉，頁1上-3上。

¹⁹¹ 《寶慶四明志》卷一一〈鄉人義田〉，頁21上。關於四明人救濟的實例，請參見梁庚堯，前引文，頁217-219。

¹⁹² 《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4上。

惜。四明舊為義郡，顯謨汪公思溫為之主盟，汪公歿，公實繼之，緩急叩門，視所請，曲為之經理，故鄉人尤歸心焉。」¹⁹³ 這種集體行善的工作是世代相續的，誠如樓鑰所說的「外祖少師汪公，太師史文惠王、舅氏尚書，暨鄉之先達與我家諸父，相繼主盟，此風不墜」。¹⁹⁴ 樓鑰又指出：「四明鄉誼最重」，¹⁹⁵ 士人、家族間的交誼可能增強了鄉里意識，更重要的是，鄉里意識得以透過士人、家族間的網絡而實踐，換言之，個人間的人際網絡成為一個鄉里「社會」活動的現實基礎。

這種集體行善的行動，在四明主要士族的推動下，於紹熙元年（1190）正式出現了獨樹一格的鄉曲義莊。推動的關鍵人物史浩說明設置的宗旨是「義田之設，專以勸廉恥。蓋賢大夫從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閒之日多，清節自持，不肯效貪污以取富，沽敗名以自卑。為士者，生事素薄，食指愈眾，專意學業，不善營生，介潔自持，不肯為屠沽之計、擊攬之態者，使各知有義田在身後，不至晚年憂家計之蕭條、男女之失所，遂至折節，汨喪修潔。故以此為勸，使其終為賢者。」¹⁹⁶ 可見四明義田莊的設置，消極方面是在幫助窮困的知識分子及官僚，積極方面則是經由集體的力量，建立經濟互助體系，以達到崇尚廉恥、培養廉能官僚的目的。一方面，從「家族」義莊到「鄉曲」義莊，顯示從個別家族興衰的考量延伸到對鄉里整個士人階層的關懷；另一面，如沈煥在建立義莊時所說：「隨時拯卹，其惠有限」，¹⁹⁷ 因此必須藉著義莊的成立，來取代臨時性的賑濟，這種發展也是前述地方家族間集體公益活動常態化、制度化的表現。

推動此一善舉的關鍵人物有三人，即史浩、沈煥和汪大猷。史浩字直翁，生於崇寧五年（1106），死於紹熙五年（1194），享年八十九，曾任國子博士、參知政事。他是宋孝宗為皇子時的老師，在孝宗朝曾二任丞相，是中興名臣，在四明地區有著卓著的聲譽與重要的影響。史浩是第一位將家族義莊推衍成鄉曲義田的人物，乾道四年（1168）他知紹興府時，為了救助貧困的知識分子，「始捐己帑，置良田，歲取其贏，給助鄉里賢士大夫之後貧無以喪葬嫁遣者，附以學而以義名

¹⁹³ 《攻媿集》卷九〇，頁838。

¹⁹⁴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43上。

¹⁹⁵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43上。

¹⁹⁶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42上、下。

¹⁹⁷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43上。

之」，並且草擬了十幾條章程，規定了收存、發放的原則。¹⁹⁸此一措施，收到良好的效果。後來，他出任知福州，又設義莊，以給濟貧苦的孕婦。¹⁹⁹

史浩任官時設置義莊的行動，發揮了救卹孤貧的作用，也是引發四明士人合作的動力。淳熙五年（1178），史浩罷相，回到四明里居。不久，奉命通判舒州，待次里居的沈煥感於「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者，念無以助」，²⁰⁰向史浩及另一位耆老汪大猷，建議設置鄉曲義田，他說：「隨時拯卹，其惠有限。吾鄉以清白相厲，其能稱物平施者，蓋可數矣，盍用會稽近比為義田之舉乎」，²⁰¹希望由史浩領導鄉里好義者推動這個善舉。史浩與沈煥有二代情誼，關係深厚。²⁰²沈煥的意見獲得史、汪二人的贊同，遂由鄉評所推許的沈煥負責實際的勸募工作。煥不辭辛苦，奔走勸募，誠意感人，鄉人「或捐己產，或輸財以買，各書於籍」，²⁰³汪大猷「率鄉之人為義莊，首割二十畝以為倡，眾皆競勸，至三百畝」，²⁰⁴四明富室邊友誠之弟，也樂於捐助修類宮、建義莊、濟饑民的費用，²⁰⁵又得到知明州林大中撥郡中絕戶的田產二頃，總共得五頃餘。²⁰⁶每年得穀近六百斛，米三之二，乃建屋十五楹於郡城西的望京門，正式稱「義田莊」。汪大猷親自規劃、訂定規章，由地方上年長孚眾望而且能幹的人來主持，敦請居鄉休致的官員，負責財務及義莊事務。²⁰⁷紹熙元年（1190），正式運作。史浩、沈煥及汪大猷三人在創置四明義田莊的貢獻最大。王應麟就指出：「始忠定里居，篤於義，仕者勉以勵廉隅，學者勸以修文行，乃為義田以濟婚葬。而汪、沈二公，比善協心，聞者樂施，其規約密，其給授公，立義以為的，一鄉莫不知義。」²⁰⁸鄉人為了感念他們的貢獻，乃繪三人的畫像於莊所。²⁰⁹

¹⁹⁸ 沈作賓，《嘉泰會稽志》（宋元方志叢刊本）卷一三，頁18下-19上。

¹⁹⁹ 《鄞峰真隱漫錄》卷八〈福州乞置官莊贍養生之家荀子〉，頁5下-8上；參見俞信芳，〈鄞籍中興宰相史浩二、三事〉，《寧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3.3(1991.6)：54-57。

²⁰⁰ 《絜齋集》卷一四，頁23下。

²⁰¹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43上。

²⁰² 梁庚堯，前引文，頁4。

²⁰³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43上。

²⁰⁴ 《玫瑰集》卷八八，頁820。

²⁰⁵ 《絜齋集》卷二〇，頁25上。

²⁰⁶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43上、下；《玫瑰集》卷八八，頁820。

²⁰⁷ 《寶慶四明志》卷一一，頁21下；《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43下。

²⁰⁸ 《深寧文鈔·撫餘編》卷一〈義田莊先賢祠記〉，頁6下。

²⁰⁹ 《寶慶四明志》卷一一，頁22上。

四明義田莊創置不久，沈煥就因病逝世，由汪大猷實際負責事務。其後樓鑰致仕，也加入經營義田莊的工作。及汪大猷死，樓鑰接替其職，轉請同郡高閌的姪兒高閌的次子高文善（曾任將作監）²¹⁰及袁燾的弟弟時任樂平丞的袁標²¹¹負責實際的莊務。樓鑰稱「椒（標）尤能周知州里，詳悉檢柅滲漏，明辨真贗，不私市恩，於是所入加多而被惠者眾。」²¹²

從四明義田莊的設置過程，到規章的擬定，乃至制度的運作，看到汪大猷、史浩、樓鑰、沈煥、袁標、高文善等著名士大夫，結合當地富人如邊氏，共同推動地方上的公益活動，建立了以民間為主、官方為輔的運作模式，這是士人家族從密切交往中，觸動鄉土關懷，自覺地建構起來的運作規範，正是四明士人展現自信與鄉土意識，所締造出的社會文化特色。

除了創置具有代表士大夫對鄉土關懷的義田莊之外，四明士人推動的公共建設尚表現在學校與橋樑的興建方面。教育是宋代士族起家的基礎，除了富有者個別建立私塾或小型書院，來教育子弟及鄉里之人外，州縣學校作為地方正式「公共」性的教育機構，在文風素盛的四明地區，也一直受到重視。自慶曆興學以來，宋廷努力於地方教育、興修學校，而受惠於學校教育而崛起科場的四明士人家族，遂把興修學校也當作一項回饋社會的建設工程，莫不廣籌經費，協助地方官，興建教室，充分體現了四明士族關懷鄉土、關心教育、提振文化的胸懷。

明州早在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即置州學，宋天禧二年（1018）守臣李夷庚移至子城之東北。²¹³建炎三年（1129）學舍被金兵所燬，當地富人袁（袁燾的祖父）的岳父曾任韶州司戶曹事的林暉，捐金錢數十萬，重建校舍，並提供半頃田地，作為養士之用，州學方始恢復舊觀。²¹⁴不過尚嫌簡陋。紹興七年（1137）仇愈守明州，才出公帑百六十萬緡，「又丐於耆舊鄉老，得錢八十萬，始益賦入，助其供給。初立重門兩序，敞其後以為講議之堂。蓋其東以為庖湢之舍，閉閤深麗，翼瓦飛聳，神位像設，籩豆俎簋，煥爛一新。於是泮宮之制，具體克備。」²¹⁵後來，州學屢圯屢修，仍不如人願。淳熙十三年（1186），岳甫任

²¹⁰ 《延祐四明志》卷四，頁43下。

²¹¹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43下。

²¹²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頁43下-44上。

²¹³ 《寶慶四明志》卷二，頁3下-4上。

²¹⁴ 《寶慶四明志》卷二，頁4上；卷八，頁31上；《絜齋集》卷八〈跋林戶曹帖〉，頁26下。

²¹⁵ 《寶慶四明志》卷九〈重建州學記〉，頁5上、下。

黃寬重

知州，周粹中為州學教授，二人同謀改建州學，明州捐錢二百萬緡。此時復任龍圖閣待制的汪大猷與侍郎史彌大，共同出面「勸激士類，鳩材 工」，²¹⁶ 樓鑰在大猷的 行狀 中對他在興修州學的角色有詳細的記載說：「庠校自兵火草創，歲久寢圯。勸率巨室，且為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徼福，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助風化。首創儀門，聞者不約而趨，覺宮一新，冠於東南。」²¹⁷ 此後，再經後代守臣、教授的擴張、增修，使明州州學「覺宇輪奐，遂甲東諸州郡之上」。²¹⁸

除州學之外，四明士人積極協助興建的縣學，亦所在多有。鄞縣縣學建於唐元和九年（814），建炎三年（1129）燬於兵火，縣學廢。至嘉定十三年（1220），鄞縣主簿呂康年請宰相史彌遠擇地重建。宋廷撥地十五畝餘，由地方官與地方士紳協力興建，當地士人捐助了四千一百緡，由鄉人王機董理，興建夫子殿。寶慶二年（1226），胡 知明州，又推動建校工程，鄉里士大夫又捐五百緡相助，才告完成。²¹⁹ 奉化縣，唐代曾在縣東北建夫子廟，是縣學的前身。景祐中曾增學宮，宣和初改建，不久因三舍法不行，縣學廢圯。建炎三年（1129）燬於兵火，紹興九年（1139）曾重建，又圯廢。慶元二年（1196），永嘉人宋晉之知奉化縣，認為教化之地壞敗不堪，無法為民典範，亟謀興建，但連歲大饑，財用空乏，縣府無力施工，幸得當地富室汪氏兄弟之助才能完成。汪伋與其弟份是舒璘的妻弟，又師事沈煥、楊簡，崇信陸學，得知縣學修建困難，認為是他的職責，「不待勸率，不謀於眾，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舊址，不日而成，一木一瓦，皆不苟設」，²²⁰ 「為長遠計，二人更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從祀分列兩廡」。²²¹ 袁燮稱讚汪氏兄弟「更新縣學，材良工堅，有助風教」。²²² 當地好義者相繼效力，「董安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人，爭趨競勸，相與再建駕說之堂，挾以一直廬，傍列諸齋，庖湏廩廩，器用畢備，凡為屋四十楹」，²²³ 這是鄉里之人提供經費、出錢出力，興建學校的佳例。嘉定七年（1214）富有的鄉人又在縣令馮多福的鼓勵下，「出

²¹⁶ 《寶慶四明志》卷二，頁4下。

²¹⁷ 《攻媿集》卷八八，頁820。

²¹⁸ 《寶慶四明志》卷二，頁5上。

²¹⁹ 《寶慶四明志》卷一二，頁8上。

²²⁰ 《攻媿集》卷五四〈奉化縣學記〉，頁509；《絜齋集》卷一九，頁5下-8上。

²²¹ 《寶慶四明志》卷一四，頁6上。

²²² 《絜齋集》卷一九，頁7上。

²²³ 《攻媿集》卷五四，頁509。

產為永業」作為養士的費用。²²⁴ 慈溪縣學建於雍熙元年（984）。慶曆八年（1048）縣令林肇徙建，由縣宰王安石作記，並請杜醇為教授。建炎三年（1129）被金兵所燬，紹興十二年（1142）重建。淳熙四年（1177）宋南強代縣令，以修學舍勸里士，於是在鄉人陳公達倡議下，完成大成殿，使之煥然一新，其後齋居、門廡、庖湑次第落成。²²⁵ 定海縣學，建於雍熙二年（985），至道年間增修，崇寧中又增廣為學宮。建炎三年（1129）燬於兵火，紹興八年（1138）改建，嘉泰四年（1204）縣令商逸卿重修明倫堂，鄉人胡大任、黃君中提供土地以擴增學舍。²²⁶

四明士人除協助興修學校外，也參與地方橋樑、堰堤的修築。如鄞縣的小溪江橋，是紹興十五年（1145）由邑人朱世彌、世則兄弟重建的。仲夏橋是紹興八年（1138），由通判舒國佐率鄉豪重建，未成，鎮官游彥忠繼續督導，由邑人莊漢英、張允明、莊椿輸財鳩工完成的。林村市盤橋是乾道六年（1170），由監務范淮率鄉人易木以石建造的，流花橋也是范淮率鄉人疊石而成的。²²⁷ 奉化縣的廣濟橋俗名南渡橋，建隆二年（961）始建土橋，後來邑士徐覃改建為木橋。紹熙元年（1190）汪伋捐家財，重新建立，橋岸均立石柱、布板其上，十分堅麗，袁燮說他「建石梁於雙溪，新既壞於南江」。²²⁸ 而在縣北與鄞縣為界的北渡，是兩縣百姓交易貨物之地，卻困於船師的多取。慶元中，汪伋請以私帑造巨舟；來往的商人每人收三文，士夫僧道免費，這是汪氏便利鄉親之舉。²²⁹ 慈溪縣的彭山閘原是縣西北群山水流入江之處，有閘儲水備水旱，歲久失修，水無法蓄積，潮水湧入，河被淤塞，淳熙十三年（1186）慈溪縣主簿趙汝積認為修閘門是根本之道，乃告諭當地父老出錢出力，建閘於彭山，築堤以捍江潮，並浚治河水，「二役之興，皆成於同僚協謀，不掣其肘，更選里士之才而公者，以司會計，不使吏預其間，故財不蠹，民不擾，一筆不施，而利興害除，可傳永久。」²³⁰ 慈溪縣的鳴鶴鄉與餘姚的上林鄉以河為界，上林的水常泛濫入鳴鶴，鄉人深以為苦。乾道元年（1165），里人曹閱捐錢二千緡，率鄉豪益以二千緡，建雙河界塘凡六百丈，使鳴

²²⁴ 《寶慶四明志》卷一四，頁6上。

²²⁵ 《寶慶四明志》卷一六，頁9上。

²²⁶ 《寶慶四明志》卷一八，頁9上、下。

²²⁷ 《寶慶四明志》卷一二，頁36上、下。

²²⁸ 《絜齋集》卷一九，頁7上。

²²⁹ 《寶慶四明志》卷一四，頁21下-22上。

²³⁰ 《攻媿集》卷五九，頁540-541；《寶慶四明志》卷一六，頁21上、下。

黃寬重

鶴地區的田地，成為肥沃之地。²³¹ 從這些造橋築堰的例子，可以反映出四明地區士族、富室，與官府協心致力鄉土建設的情形。

七、結論

四明樓氏家族的崛起與發展，是內、外諸多因素交織而成的。以外在關係而言，樓氏族人藉著同學、共事、交遊、婚姻等方式與四明地區著名士族，建立了廣泛而深遠的人際網絡。這種家族向外建立與開拓人際網絡的情況，與家族內部教育、經濟條件的改善，族人向心力的增強等因素相結合，對家族成員在學術、舉業、仕途發展，以及家族經營、資源取得、社會政治地位的提升等方面，構成相輔相成的效果。

從樓氏家族對外發展看來，婚姻關係對其家族的影響最大。誠然，幼年共同學習的經驗，使樓氏家族成員與當地士族，建立了堅實的友誼及學術基礎，在爾後仕途的發展、四明學風的推動、文化特質的塑造等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婚姻則是將彼此的關係由友誼提升到親情，以血緣來凝聚友情與鄉誼，效力顯然更大。以樓鑰為例，他的成功，固然與個人努力及家族支持有關，但外家的支持，更不可忽視。樓鑰兄弟在成長過程中，受惠於外家汪氏的養育照拂之外，更重要的是藉汪家在四明地區長期經營所奠下的深廣人脈，以及思溫、大猷二代的領袖身分，使樓鑰得以自然地擴展其人際網絡，重建樓氏在四明地區的社會地位，進而承繼汪家在四明地區的地位，成為當地的意見領袖，在地方上扮演聯絡學派及推動文化與社會建設的角色。此外，從上述樓家婚姻關係中，也可以印證，婚姻關係亦是凝聚學術流派的一股重要力量，如陸學諸弟子就由同學締結婚姻，進而建立學派的傳承，使四明成為發揚陸學的中心。

四明士族的交遊與聚會，對個人或家族關係網絡的擴展，乃至對四明地區整體文化及公共建設的提升，都有莫大的助益。透過教育、學習，得以維持四明在科舉上的優勢、提振學風、凝聚學術氣氛，使四明成為陸學重鎮，乃至溝通朱、陸、呂諸學的媒介地位。詩社、真率會等耆老的社群組織以及鄉飲酒禮的實施，有助於聯絡在鄉的官僚與士大夫的情誼，培養對地方認同感，除了可以增進鄉里團結外，更有利於塑造地方意識。從推動義田莊、鄉飲酒禮的公益及文化活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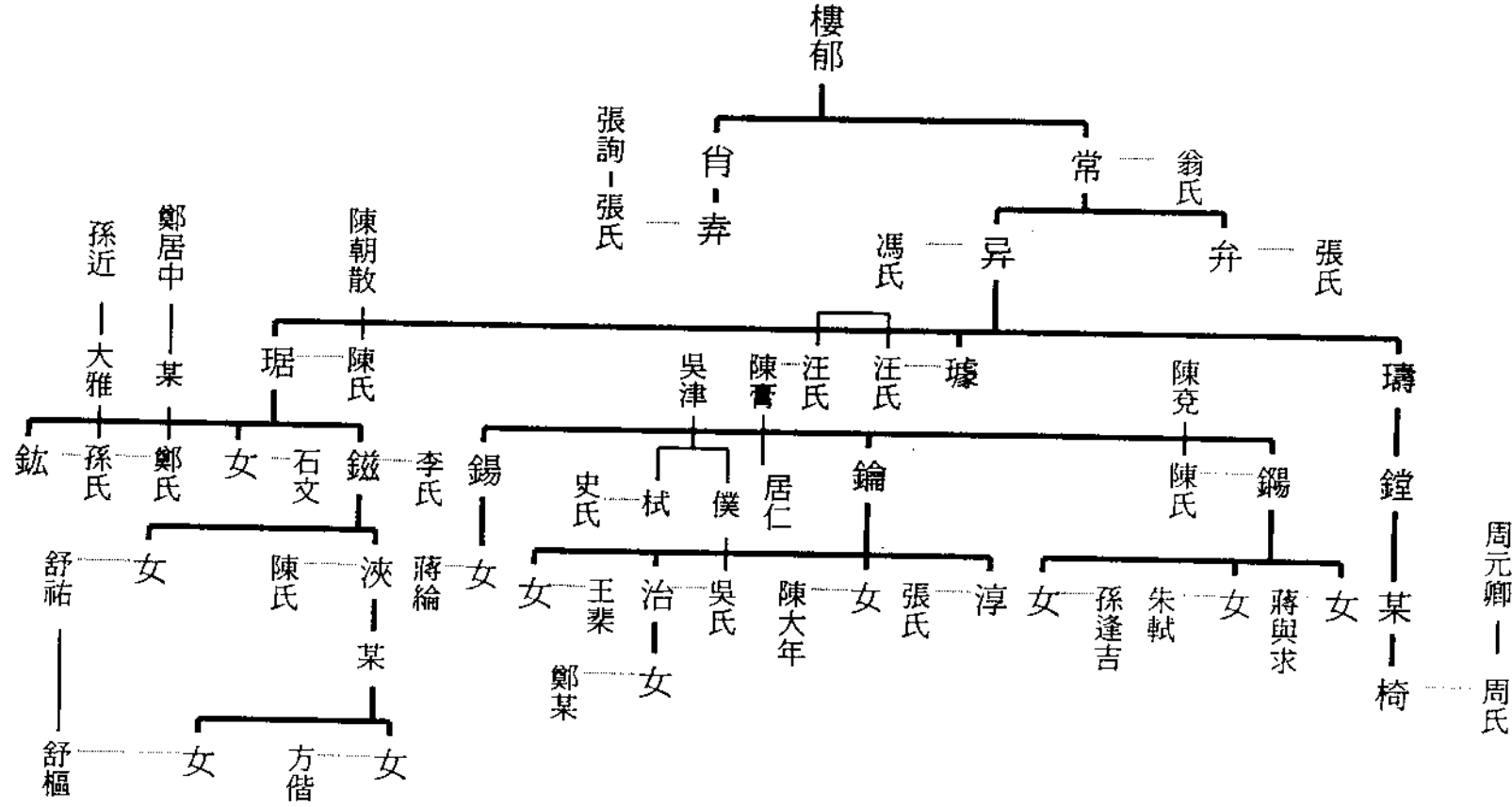
²³¹ 《寶慶四明志》卷一六，頁23上。

過程，則更能顯示四明士族對本土的關懷，藉由合作的方式，匯集、激發出集體的力量，創造具有文化特色的鄉里意識。

從樓鑰及樓氏家族所參與或推動的社會文化活動，可以看出四明地區士人不論是個人或家族，都希望藉著參與活動的機會，拉近彼此距離，維持密切關係，做為擴展人際網絡的基礎。從科舉成為宋代政治社會地位的指標以來，家族在社會中地位的升降，固然與科舉成敗、功名取得與否有相當的關係，但參與地區公共事務，或社群活動，也是擴展人際關係，提高社會聲望的有利條件。況且參與地區活動，並不以進士功名作為劃分界限的標準，使得各個家族在追逐更高的政治社會地位的同時，也注意參與推動地方公共建設與文化活動，以拉近與其他家族的關係，並維護家族的利益與形象。因此整個四明地區社會文化活動的活躍與蓬勃，顯然仰賴這些為建立家族聲望而起的家族及個人的參與及推動，有密切關係。彼此的交往，交織成綿密的人際網絡，固然是當時推動各項活動，提升社會文化的重要途徑。他們共同關懷、推動的議題，久而久之，達成共識，形成凝聚力甚強的鄉土意識，進而使四明地區創造出別具風格的社會文化特色。這種地區性社會文化特色的建立與變化，不僅影響一地的學風，亦影響家族的發展與興替。家族與鄉里社會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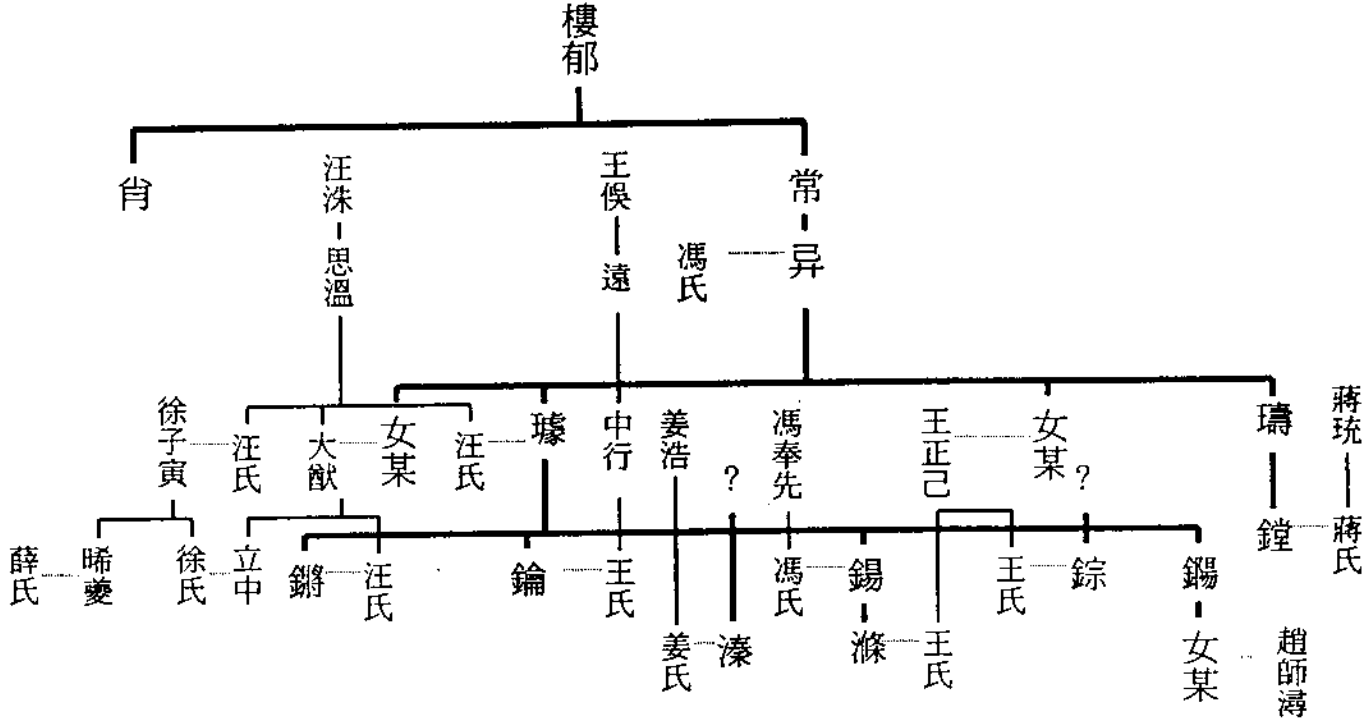
（本文於民國八八年二月二日通過刊登）

圖二：四明樓氏與外地世族通婚表



宋代四明士族入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

圖三：樓氏與四明地區世族的婚姻關係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宋元方志叢刊本。
- 王安石，《王安石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10月影印本。
- 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四明叢書本。
- 王應麟，《深寧文鈔 摭餘編》，四明叢書本。
-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四庫全書本。
- 全祖望，《鮚埼亭集》，臺北：華世出版社影印，1977年3月初版。
-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四庫全書本。
-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
- 沈作賓，《嘉泰會稽志》，宋元方志叢刊本。
- 沈煥，《定川遺書》，四明叢書本。
- 沈煥，《定川遺書附錄》，四明叢書本。
- 周必大，《文忠集》，四庫全書本。
- 孫觀，《鴻慶居士集》，四庫全書本。
- 徐松，《宋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7。
-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本。
- 袁甫，《蒙齋集》，四庫全書本。
- 袁楠，《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叢刊本。
- 袁燮，《絜齋集》，四庫全書本。
- 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宋元方志叢刊本。
- 脫脫，《宋史》，中華書局點校本。
- 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光緒十九年刊本。
- 馮可鏞輯，《慈湖先生年譜》，四明叢書本。
- 程端學，《積齋集》，四明叢書本。
- 程端禮，《畏齋集》，四明叢書本。
- 舒璘，《舒文靖公類 》，四明叢書本。
- 黃宗羲，《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影印新校本，1987年9月初版。
- 黃 ，《嘉定赤城志》，宋元方志叢刊本。
- 楊簡，《慈湖先生遺書》，四庫全書本。
- 楊簡，《慈湖先生遺書補編》，四明叢書本。
- 樓鑰，《攻媿集》，四部叢刊本。

黃寬重

黎德靖編，《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羅澹，《寶慶四明志》，宋元方志叢刊本。

二、近人論著

王德毅等

1982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包偉民

1997 宋代明州樓氏家族研究，《大陸雜誌》94.5：31-39。

伊原弘

1981 宋代浙西⁵都市士大夫，《集刊東洋學》45：50-68。

余國隆

1991 《樓鑰年譜及其行誼》，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廷燮

1984 《南宋制撫年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

俞信芳

1991 鄞籍中興宰相史浩二、三事，《寧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3.3：54-57。

倪士毅

1987 《浙江古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梁庚堯

1998 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213-237。

黃寬重

1983 《宋史叢論》，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1998 宋代四明樓氏家族的興衰歷程，《史學：傳承與變遷》，臺北：臺大歷史系主編，頁237-261。

楊寬

1965 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古史新探》，北京：中華書局，頁280-309。

歐陽光

1996 《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鄧小南

1995 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國學研究》卷三，頁463-466。

Davis, Richard L.

- 1986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Walton, Linda

- 1984 "Kinship, Marriage, and Status in Song China: A Study of the Lou Lineage of NINGBO, 1050-1250,"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8.1: 35-77.

黃寬重

Literati Networks and Socio-cultural Activities in Siming during the Song Dynasty—The Example of the Lou Lineage

Kuan-chung Hu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personal networks and social activities of literati lineages in the Siming area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hrough the Lou family lineage. It explores the Lou lineage's internal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as well as the broader iss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i networks in the Siming area during the Song, and how their local culture of learning influenced the sense of local identity.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ming Lou lineage was the result of man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Lou's first became a wealthy family through manufacturing, before becoming famous locally through education and passing the civil-service exams. At the same time, they established a widespread and deep personal network with other Siming area literati lineages through their classmates, business associates, circles of friends and marriages.

Individuals and lineage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of friends and literati lineages in Siming, which in turn raised the level of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the area. Each lineage's pursuit of education and diligent study made Siming into a particularly good place in the county for exams. This also made for a favorable academic atmosphere, particularly for Lu studies. Eventually it became a meeting point for interchanges between Zhu, Lu, and Lü studies.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village officials and local literati were promoted by regular meetings of poets, Frank and Honest meetings, a society for the aged and respected, and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wine-drinking rites. These not only fostered feelings of local identity among the literati lineages, they also spurred ambitions to mold village culture, and became the motive force for the continuous efforts made for local welfare. This was expressed in setting up charitable estates in remote rural areas for the needy lineage members, starting schools, and repairing bridges and dikes. Apart from increasing village ties, these activities clearly reoriented Siming literati lineages to local concerns. They built a specific village consciousness through cooperative methods of focussing one local group's streng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changes of this particular kind

of local social culture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study style of one place, it also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lineages, and their rise and fall. There was an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ges and village society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Siming area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Siming.

This essay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exclusive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the Lou lineage's rise an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third part elaborates on the Lou family's education and study style. The fourth part discusses how the Lou family established a strong local network through marriages. The fifth part discusses the Lou family, together with other Siming literati lineages', influence and intention in carrying out socio-cultural movements. The sixth part is an explanation of how Siming literati gathered power, and their common concerns in social welfare movements.

Keywords: Siming Lou, marriage, poetry club, village wine-drinking rites, charitable estates